

法祖講學：

明中後期《高皇帝御製文集》刊行及其意義*

郭嘉輝**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

摘 要

本文首先探討嘉靖、萬曆時期《高皇帝御製文集》的刊刻背景及緣由，由此揭示嘉靖「法祖講學」的風潮下，《御製文集》如何被湛若水、楊起元等援引佐證講學宗旨，反映晚明的學術思想是如何納入不同的材料，即使是「御製」的太祖文集亦成為士人讀本。其次釐清各版本的關係及史料價值，特別是揭示萬曆十年（1582）姚士觀、沈鈇的《御製文集》混雜《皇明英烈傳》、《遵聞錄》等小說稗史不實內容，影響清人《四庫全書》以至今人對太祖的研究。

關鍵詞：明太祖，《御製文集》，嘉靖，講學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7 年 12 月 18-20 日由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主辦的「2017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復蒙林文凱等各位老師賜正，謹此再申謝忱。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raymond.kkf@gmail.com

一、緒言

晚明思想與講學無疑是觸目耀眼，但過往討論多於理念傳承、學派消長、人物離合，忽略時代背景與傳統，以至其所導致的制度、文化甚至乎歷史記憶等各種面向。¹ 陽明（王守仁，1472-1529）於正德十三年（1518）刊《大學古本》公然挑戰朱子《大學章句》，開啟了「講學須有宗旨，宗旨源於大學」的講學風潮。² 然而儒家經典以外，晚明講學是如何挪用其他思想資源，又造成甚麼影響，亦值得關注。³ 故此，嘉靖（1522-1566）、萬曆（1573-1620）時期的《高皇帝御製文集》（以下簡稱《御製文集》）刊刻活動，正好反映當時在法祖講學的政治文化洪流下，湛若水（1466-1560）、楊起元（1547-1599）等如何將御製的敕撰書納入論學材料，進而影響時人以至於目前對太祖（朱元璋，1328-1398，在位 1368-1398）的詮釋。

更為重要的是，此時出現的：⁴ 嘉靖八年（1529）唐胄雲南刻本，⁵ 嘉靖十四年（1535）徐九皋、王惟賢江都刊本，⁶ 萬曆十年（1582）姚士觀、沈鈇鳳陽刻本，⁷ 萬曆二十五年（1597）楊起元南京禮部刻本，⁸ 萬曆末謝正蒙、熊尚文全訂

¹ 朱鴻林，《儒者思想與出處》（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 1-2。

² 劉勇，《中晚明士人的講學活動與學派建構：以李材（1529-1607）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28-91；劉勇，《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6），頁 24。

³ 呂妙芬，〈楊艸《知本提綱》研究——十八世紀儒學與外來宗教融合之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0（臺北：2012），頁 83-127；呂妙芬，〈從儒釋耶三教會遇的背景閱讀謝文海〉，《新史學》，23.1（臺北：2012），頁 105-158。

⁴ 《中國古籍總目》提到現存《高皇帝御製文集》計有明初刻本、明嘉靖八年唐胄雲南刻本、明嘉靖十四年徐九皋王惟賢江都刊本、明萬曆十年姚士觀沈鈇鳳陽刻本、明萬曆二十五年楊起元南京禮部刻本、明萬曆末謝正蒙熊尚文全訂刻本、明刻本等六種，此外尚有明初三十卷本及《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等。可見嘉靖、萬曆刊刻的《御製文集》為大宗。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集部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537-538。

⁵ 此本的卷一至十五、卷十六至二十分別藏於復旦大學圖書館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本文主要徵用後者。《高皇帝御製文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八年唐胄雲南刻本）。

⁶ 《高皇帝御製文集》（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四年徐九皋王惟賢江都刊本善本書膠卷）。

⁷ 《高皇帝御製文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姚士觀沈鈇鳳陽刻本）。

⁸ 《高皇帝御製文集》（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楊起元南京禮部刻本）。

刻本等五種版本（以下簡稱唐本、徐本、姚本、楊本和謝本），⁹ 更為盛清《四庫全書》甚至乎近人出版的《明太祖集》、《洪武御製全書》等所依據的底本，至今於明太祖研究具有重要的影響。¹⁰

故此，本文希望釐清嘉萬時期《御製文集》的刊刻背景、緣由、版本關係以至史料價值，從而瞭解這一時代的思想活動如何將太祖捲入明中後期的學術論爭，以及《御製文集》的版本流變如何進而影響後學對太祖的詮釋，以至明初史事的論述。

二、明前期《御製文集》的出現及其性質

《御製文集》始見於洪武七年（1374）十二月，除徐本的劉基、郭傳序提及外，¹¹ 宋濂於洪武八年三月的〈恭題御賜文集後〉亦提到「上忽顧內史張淵曰：『汝往取新刊文集一部，賜學士宋濂。』……蓋文集係御製，凡三帙。入梓雖訖，尚秘藏禁中」，¹² 而當中提到的「入梓」無疑與郭傳序提到的「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等固請宜鍍諸梓以貽聖子神孫」相合。¹³

⁹ 《高皇帝御製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謝正蒙熊尚文全訂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並未見宋濂序文似為不全，故本文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本。

¹⁰ 最早關於《御製文集》的版本討論為《四庫全書》的《明太祖文集》提要，四庫館臣當時採用萬曆十年姚士觀、沈鈇鳳陽刻本，僅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焦竑《國史經籍志》知悉三十卷本。李晉華《明代敕書考》雖已注意姚本、楊本與明初本、三十卷本的異同，但誤以為「姚本即據楊本校本而重校者」且未及嘉靖各版本。包遵彭與胡士萼僅釐清明初二十卷本、姚本與徐本的關係。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李根利所撰的〈《明太祖文集》版本考〉為近年最深入的成果，而該文最主要的貢獻為考證二十卷本與三十卷本的關係。所謂二十卷本與三十卷皆為洪武所編的《御製文集》，唯區別在於前者編校較完整，後者僅按體裁分為甲、乙、丙、丁集較為雜亂。永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第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集部卷169，〈集部二十二·別集類二十二·明太祖文集二十卷〉，頁3569；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2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丁氏刻本），卷35，〈集部十四〉，頁583；李晉華，《明代敕撰書考附引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頁23-25；包遵彭，〈明太祖及其文章——為太祖御製文集影印出版作〉，收入《明太祖御製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頁1-9；胡士萼，〈點校後記〉，收入明太祖撰，胡士萼點校，《明太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1），頁477-481；張德信、毛佩琦主編，《洪武御製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頁1-361；李根利，〈《明太祖文集》版本考〉，北京大學歷史系主辦，「第十二屆北京大學史學論壇」（北京：2016年3月25-27日）。蒙李根利先生賜予文稿，就此致謝。

¹¹ 劉基，〈御製文集後序〉；郭傳，〈後序〉，收入《高皇帝御製文集》（徐本），頁1a-3b。

¹² 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第2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漢苑別集》，卷2，頁990；《高皇帝御製文集》（徐本），頁4b。

¹³ 郭傳，〈後序〉，收入《高皇帝御製文集》（徐本），頁3a。

然而為何《御製文集》於此時出現？〈恭題御製文集後〉提到「且當萬機之暇，時御翰墨，多不留藁。見於侍臣之所錄者，得若干篇。臣竊以為日星昭回于天，下飾萬務，蒼生無不仰照。聖皇之文，猶日星也。是宜刻于文梓，流布四海」，¹⁴ 換言之《御製文集》並不是太祖刻意編集，而是宋濂等侍臣為保存「御墨」而提出，當然這或為推委虛詞。但說明了《御製文集》缺乏政治陳義的特質，是有別於《皇明祖訓》、《相鑒》等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敕撰書，所以日後朝臣在政治紛爭亦多以《皇明祖訓》等為據。¹⁵ 因此，《御製文集》的編纂亦較鬆散且缺乏宗旨，僅以「論、記、詔、序、詩、文」體裁分類，¹⁶ 宋濂亦提到「續有制作，復編類為後集」，¹⁷ 故《御製文集》不過是太祖「御墨」分類的文集彙編。

而宋濂之所以於此時編錄《御製文集》，則與《大明日曆》與《皇明寶訓》的編纂關係密切。¹⁸ 劉基〈御製文集後序〉提到樂韶鳳 (?-1380) 亦是編錄侍臣之一，¹⁹ 而樂氏從龍渡江任起居注，後拜兵部尚書，²⁰ 至洪武六年 (1373) 七月才改任翰林侍講學士。²¹ 同一時間，詹同則以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宋濂亦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太子贊善大夫。²² 太祖隨即以宋濂為總裁官、樂韶鳳為催纂官，下令開局選「海內文學之士」編纂《大明日曆》，使「上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以傳後世。²³ 所以宋、樂與詹於洪武六年同任翰林，顯然是為了《大明日曆》。

¹⁴ 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第 2 冊，《翰苑續集》，卷 4，頁 839-840；《高皇帝御製文集》（徐本），頁 4b。

¹⁵ 許振興，〈論明太祖的家法——《皇明祖訓》〉，《明清史集刊》，3（香港：1997），頁 69-96。

¹⁶ 劉基，〈御製文集後序〉，收入《高皇帝御製文集》（徐本），頁 1a。

¹⁷ 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第 2 冊，《翰苑續集》，卷 4，〈恭題御賜文集後〉，頁 840；宋濂，〈恭題御賜文集後〉，收入《高皇帝御製文集》（徐本），頁 5a。

¹⁸ 楊永康，〈洪武官修《皇明寶訓》及其史料價值略論〉，《國學研究》，28（北京：2011），頁 143-161；山根幸夫，〈明太祖と「寶訓」〉，收入東方學會編，《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文集》（東京：東方學會，1997），頁 1157-1170。

¹⁹ 《高皇帝御製文集》（徐本），頁 1a。

²⁰ 張廷玉，《明史》第 1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136，〈列傳第二十四·樂韶鳳〉，頁 3938-3939。

²¹ 夏原吉，《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 83，「洪武六年七月丙辰」條，頁 1488。

²² 同前引，「洪武六年七月丙辰」條、「己巳」條，頁 1488、1492。

²³ 同前引，卷 85，「洪武六年九月壬寅」條，頁 1507-1508；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第 2 冊，《鑾坡後集》，卷 10，〈《皇明寶訓》序〉，頁 762；《翰苑續集》，卷 5，〈《大明日曆》序〉，頁 874-875。

宋、樂等因而接觸到太祖起兵至洪武六年十二月以來禮樂、征伐、刑政、群臣、四夷等各類文獻，從而編成一百卷《大明日曆》。職是之故，宋濂又以「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者」為由，仿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在位 627-649）《貞觀政要》分「敬天」至「制蠻夷」等四十類，編成《皇明寶訓》五卷。²⁴ 洪武八年，宋濂又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成《洪武聖政記》。²⁵ 日曆、寶訓、聖政記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太祖與文臣「垂法後世」共識下的產物。因此，《御製文集》不過是編集《大明日曆》的「副產品」，並注定其政治意義遠遠不如《皇明祖訓》、《大誥》般重要。

因此，《御製文集》更多的是作為一種「御製」的禮儀賞賜，以呈現君臣共融。洪武八年三月，宋濂〈恭題御賜文集後〉早已提到「淵引臣至典禮紀察司，與司副李彬言，紀臣氏名於籍，始頒受焉。蓋文集係御製，凡三帙。入梓雖訖，尚秘藏禁中。當時受賜者，唯太師李韓公善長，中書右丞相胡惟庸，與臣為三人」，²⁶ 可見《御製文集》當時是用於賞賜臣下，而有典禮紀察司記錄。其時僅李善長（1314-1390）、胡惟庸（?-1380）、宋濂受此禮遇。洪武十年宋濂致仕，又再獲賜《御製文集》。²⁷ 此亦說明何以正德、嘉靖的寧王宸濠、隰川王俊樞、慶成王奇瀆、瀋王胤穆等請求頒賜《御製文集》。²⁸ 隰川王、慶成王與瀋王並非新封，而瀋府與慶成府早於永樂（1403-1424）開府。按理來說，他們早應接觸到《御製文集》，不至於待至正德、嘉靖。可見，《御製文集》更多的是作為一種賞賜多於其內容意義。並因此性質，使其在明前期流通不廣。

直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丘濬（1421-1495）上《大學衍義補》才出現改變。《大學衍義補》進呈後，受到孝宗（朱祐樞，1470-1505，在位 1487-1505）重視，下令發福建布政司書坊刊行，當中先後兩處引用《御製文集》。首先且最重要一條，即卷二十二〈治國平天下之要〉的〈制國用·貢賦之常〉，丘濬就「〔漢〕文

²⁴ 顧炎武輯，《皇明脩文備史》，《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8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清抄本），《皇明寶訓》，頁 13-57；楊永康，〈洪武官修《皇明寶訓》及其史料價值略論〉，頁 143-161。

²⁵ 宋濂，《洪武聖政記》（北京：中書華局，1991），〈洪武聖政記序〉，頁 1；許振興，〈《洪武聖政記》考索〉，《東方文化》，40.1-2（香港：2005），頁 28-38。

²⁶ 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第 2 冊，《漢苑別集》，卷 2，頁 990；《高皇帝御製文集》（徐本），頁 4b。

²⁷ 夏原吉，《明太祖實錄》，卷 111，「洪武十年正月乙酉」條，頁 1839。

²⁸ 費宏，《明武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 37，「正德三年四月丙申」條，頁 892；張居正，《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 30，「嘉靖二年八月乙未」條、「十二年六月辛巳」條，頁 805、3447。

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一條，引用《御製文集》的十一篇太祖減免稅糧詔令，以說明太祖理財有道，於開國創制繁多之時，仍能「免租之詔，無歲不下」的聖君形像。²⁹ 這一條不僅成為嘉靖元年（1522）浙江鄉試的題目，³⁰ 而且更為湛若水《聖學格物通》輯錄，並謂「此御製文集之言也。夫我太祖登極之初，干戈甫定，凡百興作皆資於財。然而免租之詔，無歲無之。蓋太祖不忍之心存於中，故不忍之政發於外。蓋有不期而必至者矣！悲人窮以凝天命，此豈非其大端也歟」，³¹ 足見其深入流通於士林。其次，則是卷六十六〈治國平天下之要〉的〈秩祭祀·釋奠先師之禮〉引《御製文集》的〈國子祭酒誥〉說明國子監祭酒進行釋奠禮的意義。³²

此外，丘濬《瓊臺會稿》的〈南溟奇甸賦〉亦引〈勞海南衛指揮〉詠發海南的遙遠與風俗，而其同鄉後學唐胄更於正德十六年（1521）的《瓊臺志》以〈形勝〉與〈氣候〉輯錄。³³ 可見，明前期在《御製文集》尚未流通的情況下，丘濬著作特別是《大學衍義補》成為《御製文集》的載體，為當時士子認知《御製文集》內容的要途，湛若水《聖學格物通》與唐胄《瓊臺志》可為明證。

三、法祖講學：刊行的背景及其意義

在此脈絡底下，嘉靖八年（1529）時任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的唐胄將《御製文集》刊刻則具有劃時代意義，徹底改變其敕撰書的性質。若比較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出版的明初本，則發現除缺〈祭小張國公〉、〈祭江陵侯吳良〉及〈祭孔希學〉等三篇及字數偶有出入外，則幾乎完全相同。唐於〈後序〉提到「監察劉御

²⁹ 丘濬，《大學衍義補》，《四庫全書》子部第7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22，頁305-306；《明太祖御製文集》，卷1、2，頁42-54、82-85。

³⁰ 李濂，《嵩渚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1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卷77，〈嘉靖壬午科浙江鄉試策問五首〉，頁241-242。

³¹ 湛若水編著，《聖學格物通》第9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五年（1866）資政堂刻本），卷94，〈平天下格·蠲租〉，頁3661-3662。

³²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66，頁753；《明太祖御製文集》，卷4，頁144-145。

³³ 《瓊臺志》先後於〈形勝〉、〈氣候〉、〈海防〉與〈名宦〉等四處提到徵引自《御製文集》，而〈海防〉與〈名宦〉分別出自〈勞海南衛指揮敕〉與〈命中書召李思迪〉。唐胄，《正德瓊臺志》，《海南地方志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卷4、21、33，頁73、75、465、701；《明太祖御製文集》，卷7、9，頁225-226、316。

史桌頃按其地，得鈔本於黔國公紹勛，即屬胄恭梓之」，³⁴ 黔國公沐氏家族自沐英 (1345-1392) 以降世守雲南，府中鈔本應於明初頒賜。正因《御製文集》賞賜的性質，才使黔國公沐紹勛 (?-1536) 世代相傳。要之，唐本不過是明初本的復刻版。

既然如此，唐胄何以多此一舉，再行刊刻《御製文集》？這或與其學官的經歷相關，特別是〈後序〉提到：

其秘府御製文集久已昭回寰宇，惟雲南以遠未及。監察劉御史桌頃按其地，得鈔本於黔國公紹勛，即屬胄恭梓之。蓋滇自開闢以來，至聖代始得，儷治於華百餘年，民夷不識不知，已相忘於道化之妙。茲舉也，欲其士之有覺者，知聖之製，真所謂聖人之心。³⁵

唐胄自嘉靖三年八月從廣西按察司僉事改提督學校，³⁶ 令土官及瑤蠻遣子入學並「以身範士，督師生習冠射諸禮，即僻邑遐陬，巡歷皆遍」，故嘉靖十一年古田鳳皇寨賊以「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學者」而受其撫諭解甲。³⁷ 嘉靖六年任雲南提學副使，禮部尚書桂萼 (?-1531) 雖言「天下提學官多不得人」但仍以唐胄任職如故。³⁸ 可見，長年提學於西南的唐胄熱衷文教，故欲以《御製文集》使「欲其士之有覺者，知聖之製」。再者，正德十六年 (1521) 唐胄編《瓊臺志》時，除抄錄《瓊臺會稿》外，更有於〈海防〉與〈名宦〉輯錄《御製文集》的〈勞海南衛指揮敕〉與〈命中書召李思迪〉。³⁹ 這除了證明黔國公鈔本的可信外，更重要的是反映唐胄是刻意使「秘府御製文集」公諸於世。

³⁴ 《高皇帝御製文集》(唐本)，頁 2a。

³⁵ 同前引，頁 1b-2a。

³⁶ 張居正，《明世宗實錄》，卷 42，「嘉靖三年八月丁未」條，頁 1098；張廷玉，《明史》第 18 冊，卷 203，〈列傳第九十一·唐胄〉，頁 5357-5359。

³⁷ 張廷玉，《明史》第 18 冊，卷 203，〈列傳第九十一·唐胄〉，頁 5357-5359；王弘誨，〈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西洲唐公神道碑〉，收入唐胄著，劉美新點校，《傳芳集》，《海南先賢詩文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頁 220-225。

³⁸ 張居正，《明世宗實錄》，卷 81，「嘉靖六年十月壬戌」條，頁 1808-1809；王弘誨，〈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西洲唐公神道碑〉，收入唐胄著，劉美新點校，《傳芳集》，《海南先賢詩文叢刊》，頁 222。

³⁹ 唐胄，《正德瓊臺志》，卷 4、21、33，頁 73、75、465、701；《明太祖御製文集》，卷 7、9，頁 225-226、316。

(一)法祖講學：嘉靖初期政局

唐胄為何希望將《御製文集》公諸於世？其實與當時背景有莫大關係。⁴⁰ 法祖與奉天、敬天、事天，一直是對明代新君的期許。⁴¹ 但到了嘉靖卻出現變化，鑑於正德荒誕亂政，朝臣都希望革新時局。⁴² 世宗（朱厚熜，1507-1567，在位1522-1567）即位伊始，吏部尚書王瓊（1459-1532）和九卿等官會疏「取《祖訓》」及「舉經筵日講之儀，以緝熙聖學」，⁴³ 而孫承恩更擴充為「端本始」的十一事：正始、修身、敬天、法祖、勤政、講學、慎微、持志、謹好尚、簡近習、溥仁恩事，⁴⁴ 而世宗策問張治時亦提到「朕奉天明命，嗣承祖宗大統，臨御以來，釐革弊政，委任舊臣。凡夫敬天、法祖、修德、勤政、求賢、納諫、講學、窮理、節財、愛民諸事，惟日孜孜次第舉行，取〈無逸〉中嘉靖殷邦之一語，建號紀元，方將體元居正，以求儷美」，次第、類目雖與孫承恩並不盡相同，但卻見法祖、講學儼然成為嘉靖新政的重要指引，與之同時更多達約三十片相類的奏疏。⁴⁵ 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王鏊（1450-1524）的〈講學篇〉更提到「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⁴⁶ 可見法祖深契講學以構建聖學，故湛若水利用嘉靖四年七月四日司禮監所傳「令文臣撮經書、史鑒有關帝王德政之要者，直解進覽」的機會撰進《聖學格物通》，以祖訓佐證其「隨處體認天理」的宗旨，希望取得世宗的認同，⁴⁷ 因而密切結合祖訓與講學。

不僅如此，法祖更深深捲入「大禮議」的爭端，撤除《皇明祖訓》「兄終弟及」所引發「繼嗣繼統」的問題外，世宗為使生父興獻王（朱祐杭，1476-1519）

⁴⁰ 唐胄於〈後序〉提到以《御製文集》瞭解「聖學」，無疑是呼應嘉靖初年以「法祖」與「講學」倡論「聖學」的背景。《高皇帝御製文集》（唐本），頁 1a-b。

⁴¹ 楊士奇，《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 24，「永樂元年十月癸丑」條，頁 436-437；楊士奇，《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 13，「宣德元年正月戊戌」條，頁 345。

⁴² 朱鴻林，《儒者思想與出處》，頁 142-144。

⁴³ 張居正，《明世宗實錄》，卷 1，「正德十六年四月丁未」條，頁 44-45。

⁴⁴ 同前引，卷 2，「正德十六年五月庚申」條，頁 88。

⁴⁵ 同前引，「正德十六年五月丙寅」條，頁 95-98；朱鴻林，《儒者思想與出處》，頁 142-144。

⁴⁶ 張居正，《明世宗實錄》，卷 20，「嘉靖元年十一月庚申」條，頁 588-589；王鏊著，吳建華點校，《王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講學篇〉，頁 292-293。

⁴⁷ 朱鴻林，《儒者思想與出處》，頁 142-162。

入祔太廟，不惜改革禮制，推行天地分祀，「法祖」更為其重要的口實和依據。⁴⁸ 嘉靖九年六月《大明集禮》的重新刊刻，無疑是為了奧援天地分祀，以利日後改動太廟。⁴⁹ 再加上，世宗曾令包括《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在內的皇祖御製文集重修，⁵⁰ 以至載有《大明令》、《洪武禮制》、《稽古定制》、《孝慈錄》、《教民榜文》、《禮儀定式》及《大誥》等洪武祖制的《皇明制書》刊刻，毋寧反映這政治背景下促使祖訓、祖制紛紛「昭回寰宇」。⁵¹ 洪武時期因而受到莫大關注，嘉靖二十三年吳朴著《龍飛紀略》以編年記述洪武一朝史事，揭開了明中後期私家修史序幕。⁵² 其後陳建（1497-1567）以《龍飛紀略》「徒詳于細碎」、「劄要多遺」而編成《皇明啟運錄》，並擴充為《皇明通紀》。⁵³ 往後更有嘉靖三十六年高岱《鴻猷錄》、嘉靖四十一年鄭曉《吾學編》等私家撰修的當代史。所以，禮制改革不僅使朝臣熱切地關注祖制，而且喚起知識分子對祖訓、祖制的興趣，促成「開國史」的出現。所以，唐胄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刊刻《御製文集》，希望「欲其士之有覺者，知聖之製，真所謂聖人之心。」

（二）湛若水與《御製文集》

與之同時，在這法祖講學背景下，最資深且最具名望的翰林湛若水，為支援楊廷和（1459-1529），於嘉靖七年（1528）撰進《聖學格物通》。⁵⁴ 而此舉之意義在於將太祖連結至湛若水的學術思想。〈聖學格物通大序〉提到：

伏觀我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大學》一書，其要在脩身。而《大學古本》以脩身釋格至，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經文兩推，天下國

⁴⁸ 尤淑君，《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6），第1章、第3章。

⁴⁹ 張居正，《明世宗實錄》，卷114，「嘉靖九年六月庚午」條，頁2706。

⁵⁰ 同前引，卷187，「嘉靖十五年五月乙卯」條，頁3949-3952；郭嘉輝，〈略論《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及其史料價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1（香港：2015），頁171-189。

⁵¹ 山根幸夫，〈皇明制書解題〉，收入張鹵編，《皇明制書》（東京：古典研究會，1967），頁7-9。

⁵² 楊豔秋，〈明代中後期私修當代史的繁興及其原因〉，《南都學壇》，23.3（南陽：2003），頁27。

⁵³ 莊興亮，〈明代史家陳建的學術生平及其《皇明通紀》研究述評〉，《史學史研究》，4（北京：2013），頁29-30。

⁵⁴ 朱鴻林，《儒者思想與出處》，頁129-176。

家身心意，皆歸其要於格物，則聖祖蓋深契夫《古本大學》之要矣乎！
由是言之，聖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⁵⁵

湛若水從否定陽明《大學古本》轉為認同，關鍵在於發現《大學古本》更能支持其「隨處體認天理」的宗旨。⁵⁶ 因此，〈聖學格物通大序〉以《大學古本》「以脩身釋格至」詮釋太祖諭侍臣「《大學》一書，其要在脩身」，⁵⁷ 以論證太祖深契《大學古本》亦即合乎湛若水提出致知即格物，而以格物從事聖學的主張。⁵⁸ 甘泉的再傳弟子唐伯元 (1541-1598) 亦於進書疏中引〈聖學格物通大序〉指《石經大學》的格物即是修身之意，可見其於晚明思想的影響。⁵⁹ 而《聖學格物通》最少 114 處徵引《明太祖實錄》或《明太祖寶訓》，如〈正心格·正心下〉提到洪武十八年 (1385) 太祖與朱善 (1340-1413) 進讀《心箴》，甘泉即道：

臣若水通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此盛則彼衰，乘除之理然也。我皇祖諭學士，以人心道心，倚伏之幾，其深得帝王精一之傳乎。夫心一而已矣，純乎天真，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即人心，非有二也。仁愛正直羞惡忠慤之心，皆天理也。忮害邪詖貪鄙巧偽之心，皆人欲也。天理日進，則人欲日消。人欲消盡，則純是天理，化之者為聖人。故君子之學，在隨處體認天理而已矣。千聖千賢之貫也，此聖祖實開一代心學之原也。⁶⁰

所以《聖學格物通》援引祖訓，無非為佐證其「隨處體認天理」學說。正因甘泉將太祖契合於其學術主張，無可避地使太祖捲入晚明講學活動，促成《御製文集》的再次刊刻。嘉靖十四年徐九皋、王惟賢的江都刊本則是因此而成，徐於〈後序〉提到：

⁵⁵ 湛若水編著，《聖學格物通》第 1 冊，頁 82。

⁵⁶ 劉勇，《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頁 27-39。

⁵⁷ 夏原吉，《明太祖實錄》，卷 203，「洪武二十三年七月壬辰」條，頁 3035；《明太祖寶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 1，〈論治道〉，頁 17。

⁵⁸ 朱鴻林，《儒者思想與出處》，頁 131。

⁵⁹ 同前引，頁 373。

⁶⁰ 湛若水，《聖學格物通》第 2 冊，卷 20，頁 864-865。

會提學御史臣聞人詮以滇本遺臣，謂宜重鈔諸梓。臣乃檄江都知縣王惟賢刻焉。惟賢復搆得甲、乙、丙、丁四集，間多前集所未登錄。蓋當時侍從文學之臣各自纂記，以故編次不倫。臣乃躬自讐校，互相補除，合六百七十二篇，仍分為二十卷。⁶¹

可見，這次刊刻是源於聞人詮將唐本交予徐九皋並囑其「重鈔諸梓」，徐即聯同王惟賢輯入「甲、乙、丙、丁集」而成。然而三人之間存在甚麼關係而合作刊刻《御製文集》？這一點可於嘉靖二十四年《嘉靖惟揚志》中「甘泉山書館」找到答案：

甘泉山書館，在府城大東門外，嘉靖七年貢士葛澗勗建。巡鹽御史朱廷立、徐九皋、陳蕙、洪垣，提學御史聞人銓〔按：詮〕，知府侯秩、劉宗仁，知縣王惟賢相繼脩拓，侍郎呂柟撰記。義路坊，提學御史聞人詮立。禮門純正門，御史徐九皋立。至止堂，祭酒鄒守益記。學習誠明齋，東西八間。自然堂，湛若水撰銘。倉房，在堂西。仰宸樓，中刻敬一箴，湛若水書，藏《御製文集》，扁玉音純，正有本之學，徐九皋撰記。⁶²

呂柟 (1479-1542) 於〈甘泉行窩記〉提到「甘泉山書館」本稱「甘泉行窩」，為國子監祭酒湛若水於嘉靖六年上京考績時，貢生葛澗「請立會友約」選址城東而建。⁶³ 而聞人詮於〈會華書院記〉提到「聞人子嘗受學于甘泉陽明兩先生之門，每得聞為學之訓，輒以語諸同志曰：道其可知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隨處體認天理，以致其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自孟氏沒而聖學失傳，有宋濂洛諸賢始復明之，繼濂洛而有賢者，其惟二公乎！」而且嘉靖十三年又於九華為湛若水興建書院以備講學，⁶⁴ 可見聞人詮不僅受學於湛甘泉，而且關係匪淺，故與湛氏門人洪垣等參與增修。⁶⁵ 而《嘉靖惟揚志》亦提到王惟賢曾為湛若水刊行《遵道

⁶¹ 《高皇帝御製文集》（徐本），頁 6a-b。

⁶² 盛儀，《嘉靖惟揚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12 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1963 年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殘本景印），卷 7，頁 15b。

⁶³ 呂柟，《涇野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61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四年于德昌刻本），卷 16，頁 155-156。

⁶⁴ 王崇，《嘉靖池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8 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1），卷 9，頁 80a-b。

⁶⁵ 黃宗羲，《明儒學案（修訂本）》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39，〈甘泉學案三·郡守

錄》。⁶⁶ 至於徐九皋與湛若水的關係，則詳細記於〈仰宸樓記〉：

歲乙未，會稽徐子理鹽惟揚間，至肄射講業焉。周視垣宇，以為未慊於志高。教授簡用為，請迺檄江都王尹惟賢拓址闢墉，仍于自然堂之北，創樓六楹，庸廣游息，凡三閱月而落成。夏六月，徐子問焉曰：惟先生為道宗，盟樓以永教也。幸畀之名示訓，以照臨多士。先生曰：夫道廣矣大矣，吾何敢知。惟皇極之敷言，照臨下土，精一授受，豈有加焉。二三子則祇若勤勵矣，吾何敢知？迺手書敬一箴，俾刻置北壁曰：庶乎！瞻仰宸翰，敬蚤夜焉，以近天子之光，題其樓曰仰宸。嗚呼！至乎其教之也。教授簡率多士來請記，徐子曰：夫道廣矣，吾何敢知。主盟斯道，則有先生在。秋八月，先生適有事于泗，駐節惟揚，徐子得從杖履登覽焉。徹視宇宙，凌軼塵氛，高明廣大，儵然遽然，不知余之與天為徒也，乃仰而嘆曰：嘻！大觀矣哉！臯也登斯樓，而見聖人之心之高明之廣大也，而見聖人之高明之廣大之學也。高明廣大，其體乎？敬其功乎？聖敬日躋焉。是故灑然弗以物累也。夫是以高明焉，廓然弗以物蔽也。夫是以廣大焉，廣大配天地，高明配日月。其唯克一乎？非敬其孰能之，先生之教，體認天理焉至矣。⁶⁷

徐九皋服膺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學，嘉靖十四年（1535）理維揚鹽政期間從學，當時以行窩「未慊於志高」遂建「仰宸樓」，而該年六月徐九皋更請甘泉為樓命名，八月又「從杖履登覽」。可見這一年間徐、湛的論學往還密切。必須注意的是前引《嘉靖惟揚志》亦提到《御製文集》正是藏於「仰宸樓」，而徐本的刊刻正是於嘉靖十四年的十一月。換言之，「仰宸樓」的修建幾乎是與《御製文集》的刊刻同時進行。

「仰宸樓」之所以名為「仰宸」，乃因湛若水提「瞻仰宸翰，敬蚤夜焉，以近天子之光，題其樓曰仰宸」，而徐九皋於〈仰宸樓記〉又載「惟時甘泉先生學溯濂洛道跂洙泗，所謂咸有一德者矣，推明敬一之訓，振德於天下。惟江都葛生澗，蚤歲從先生遊，率萃同志服習至教，爰創甘泉山書院」，⁶⁸ 可見湛若水於當地的講

洪覺先生垣〉，頁 927-947。

⁶⁶ 盛儀，《嘉靖惟揚志》，卷 12，〈經籍志〉，頁 11b。

⁶⁷ 同前引，卷 37，頁 11b-12b。

⁶⁸ 同前引，頁 12a。

學活動與《敬一箴》關係密切。而《敬一箴》為世宗於嘉靖五年所製，為「帝王傳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並令提學官摹刻於府州縣學。⁶⁹ 嘉靖十年時任禮部左侍郎的湛若水上〈進聖學疏〉提到「敬一箴有曰：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則敬一之相為功用已，章章乎明矣。故日用之間，隨時隨處，隨動隨靜，存其心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天理日見焉。」⁷⁰ 可見湛氏之於《敬一箴》不過是佐證其「隨處體認天理」之學，這一點亦是他在《聖學格物通》援引祖訓之目的。

故此，徐九皋、王惟賢、聞人詮於揚州重新刊刻《御製文集》毋寧是受到湛若水講學的影響，嘉靖十四年藏有《御製文集》的仰宸樓建成無疑是證明了這一點。而這一切都是由於湛若水利用祖訓佐證其「隨處體認天理」宗旨所致，自此《御製文集》的刊刻更與晚明講學密不可分。

然而到了隆慶、萬曆之際，高拱（1512-1578）、張居正（1525-1582）不僅禁止督學御史聚徒講學，更於萬曆七年（1579）下令毀天下講學書院。⁷¹ 再加上，王學又發展出王畿（1498-1583）、鄒守益（1491-1562）與王艮（1483-1541）的精英式、庶民式講學，⁷² 這些都使得萬曆講學環境、方式都有別於嘉靖。故此，值得考慮的是其後的《御製文集》是基於怎樣的因素而促成刊刻，而這又與嘉靖存在怎樣的區別？特別是萬曆中後期刊刻《御製文集》的楊起元、謝正蒙均與泰州王門關係密切。

（三）萬曆的接續：從沈鈇至羅汝芳、楊起元的潛流

湛若水以祖訓釋宗旨，令《御製文集》契合講學，從而使日後萬曆的刊刻更進一步捲入晚明的學術論爭。而王門等學術的脈動更是推動萬曆中後期《御製文集》刊刻轉向的關鍵，有別於嘉靖法祖講學的政治背景。日後顧憲成（1550-1612）、陳懿典（1554-1638）與李贄（1527-1602）等修正王學者或泰州王門以《御製文集》進行三教合一論爭，毋寧反映萬曆刊刻的這一獨特思想面向。

萬曆十年（1582），巡按直隸督學御史姚士觀、南京戶部督儲主事沈鈇於鳳陽再度刊刻《御製文集》。而姚氏於目錄後的序文提到「是集曩刻之維揚，迺中都為

⁶⁹ 張居正，《明世宗實錄》，卷 69，「嘉靖五年十月庚午」條，頁 1578。

⁷⁰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57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黃楷刻本），卷 19，頁 44。

⁷¹ 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 128。

⁷² 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 122、278、284。

聖祖龍興之邦，繫獨缺焉。偶于年友沈鈇氏獲睹舊本，持以歸之署中，炳蕭盥沐，跪誦數遍，祇覺聖謨洋洋盈耳，忘倦也。是用侍史染翰，刷人供役，冀與都人士共焉，⁷³ 沈鈇在〈刻御製文集跋〉亦提到「侍御姚士觀氏以校文至作而嘆曰：文獻亡征，厥咎在我。遂謀之臣鈇。臣鈇搜獲舊鐫，授之侍御者，相與盥薇露，焚玉蕤，握讀未竟楮，輒沾沾自喜曰：中都士其厚矣乎！」⁷⁴ 可見是次刊刻無疑是接續徐本而成，而當中沈鈇更起著關鍵的角色。透過剖析其背景經歷，則見是次刊刻其實亦與論學密切相關。《康熙詔安縣志》的〈沈鈇傳〉提到：

沈鈇，號介庵，清骯不投時好，年二十五成進士……與天臺、見羅、青螺、南臯諸先輩，明道譚學，所知如賀對揚、李愚公、王十華、薛藩、馬夢吉諸君子，悉其契交……居家倡置學田以贍儒生，創橋路以便行旅，建文昌、文公諸祠以興文學，置亭觀以開福田。接引承學，教誨子弟。所著有大學古本、浮湘、鍾離、蘭省、石鼓諸集、彭湖紅夷諸議。⁷⁵

自陽明於正德十三年 (1518) 刊《大學古本》公然挑戰朱子《大學章句》，開啟明代中後期的講學風潮，特別是「講學須有宗旨，宗旨源於大學」的建構學說模式。所以沈鈇著《大學古本》無可避免地捲入王陽明、湛若水、方獻夫等於《大學古本》的論爭，⁷⁶ 再加上其與耿定向 (1524-1597)、李材 (1529-1607)、郭子章 (1543-1618) 及鄒元標 (1551-1624) 等鴻儒「明道講學」，無疑契合晚明講學活動。耿定向於〈劉調甫六首〉提到「往因沈介菴病中著贅言，發文成學，旨已呈賢覽矣」，⁷⁷ 而楚王孫潛智昆仲為沈鈇刊的《浮湘集》亦是邀天臺寫序。⁷⁸ 萬曆十五年 (1587) 沈又曾為李材刊刻《經世大論》，⁷⁹ 以至《康熙詔安縣志》提到文昌祠為「明萬曆間布政郭子章，從邑人沈鈇請，檄下知縣夏宏建于文廟前東隅」，⁸⁰

⁷³ 《高皇帝御製文集》(姚本)，頁 38b。

⁷⁴ 同前引，頁 6a-b。

⁷⁵ 秦炯，《康熙詔安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第 31 冊(上海：上海書店，2000，清同治十三年 (1874) 刻本)，卷 11，〈人物·沈鈇〉，頁 573。

⁷⁶ 劉勇，《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頁 19-59。

⁷⁷ 耿定向，《耿天臺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31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六年 (1598) 劉元卿刻本)，卷 4，頁 108。

⁷⁸ 同前引，卷 11，〈沈介菴浮湘集序〉，頁 290-292。

⁷⁹ 劉勇，《中晚明士人的講學活動與學派建構：以李材 (1529-1607) 為中心的研究》，頁 141-142。

⁸⁰ 秦炯，《康熙詔安縣志》，卷 4，〈建置志〉，頁 459。

凡此種種都證明沈與晚明群儒交情非淺。而《乾隆清泉縣志》中「石鼓書院」一條，則更能清楚說明其學術主張：

蓋七賢云祠後有砥柱，中流一石坊，坊後一祠，祀寓賢湛甘泉若水、鄒東廓守益、程天津弘忠，鄉賢祝岫嶼詠、劉岳亭黻、劉仁山穩、王楚陽萬善亦為七賢，各肖其像，乃同知沈鈇請於學使，檄知府陸志孝覈實行之……萬曆二十年同知沈鈇大書濯纓濯足於石。⁸¹

沈鈇任衡州府同知乃萬曆十五年鄖陽兵變後，⁸² 可見此祠的興建與刊刻時間接近。在「鄉賢」外，沈鈇更祀湛若水、鄒守益、程弘忠為「寓賢」，湛、鄒二人未曾任職衡州，而程弘忠僅為布衣。所以沈氏視他們為「寓賢」的考量並不在事功，這一點從可見於程弘忠的生平。《本朝分省人物考》載：

布衣程弘忠，字汝一，別號天津，歙人。父業賈，貧不能資之學。性敏，嗜文義，間發為詩，士人覽之曰：是深于學者也！年二十九師王心齋于泰州，遂專意問學。三年欣然有得，因涉歷四方，徧從鄒東廓、王龍溪、羅近溪、耿楚侗考業，一時賢碩，咸嘉樂焉。後遊衡岳，曾植齋延之書院數年，所至啟發，人無賢愚，必有興起。萬曆癸酉，自衡之粵，謁陳白沙、湛甘泉墓，還疾作卒于廣城書院。其學宗心齋，而自經參悟，不為依傍，學者樂就之。⁸³

程弘忠最為時人所重者為其學，其先從學王艮，繼問學於鄒守益、王畿、羅汝芳 (1515-1588) 等，而萬曆元年 (1573) 更親謁陳獻章 (1428-1500)、湛若水之墓，可見他或受學或服膺於鄒守益、湛若水。沈鈇視他們三人視「寓賢」正反映他的學術傾向，不僅深契近溪門人，而且尊崇白沙、甘泉。耿定向於〈沈介菴浮湘集序〉提到「惟孔孟正脈，是發高皇彝訓。是欽無乃夫子浮海，意與不然。大夫由鄖

⁸¹ 江恂，《乾隆清泉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南府縣志輯第 37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卷 12，〈學校志·書院〉，頁 132。

⁸² 顧秉謙，《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 192，「萬曆十五年十一月戊子」條，頁 3608。

⁸³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53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啟刻本），卷 36，頁 731。

而衡陽，而鄂城，隨歷注厝，惠殫化流，一言而上契宸衷，下愜輿情，由今言之，道亦已行」及「而廖恒石氏述大夫學指識其大矣，意必得道林。先生格物旨而識仁，顧大夫以身發之矣」，⁸⁴ 耿天臺與其師近溪在論學上都是推崇太祖，⁸⁵ 當中提到「惟孔孟正脈，是發高皇彝訓」將太祖契合於理學的道統，再加上沈鈇以「格物旨而識仁」且著有《大學古本》，自然離不開以「格物」為旨的《聖學格物通》及甘泉、陽明等的《大學古本》爭辯。可見，沈鈇在法祖講學的餘波下再加上其熱衷講學的主張，因而促成是次《御製文集》的刊刻。

沈鈇不僅與耿定向熟稔，而且更認識同為近溪門人的楊起元。復所《證學編》載有〈沈介庵書〉提及他們之間的論學。⁸⁶ 所以，思想往來並不是單線的，而是有各種力量同時競合，彼此的層次分合更是模糊難定。⁸⁷ 《御製文集》的刊刻並不限於甘泉一脈，泰州王門亦深契於此，特別是沈鈇所祀的寓賢程弘忠更是從學王艮。但王門與太祖的連結並非始於《大學》，而是在於六諭。陽明巡撫南贛時首次結合六諭與鄉約，而有《告諭鄉民》及《南贛鄉約》。陽明門人薛侃（1486-1545）、鄒守益亦致力推行這類結合六諭的鄉約。嘉靖末年鄉約從「約」轉化為「教」，故有嘉靖四十二年（1563）羅汝芳以《聖諭》為指導思想寫成白話《寧國府鄉約訓語》。⁸⁸ 正是因此，萬曆十五年（1587）近溪門人所編的《會語續錄》，⁸⁹ 更以此直指近溪「孝弟」宗旨是上接道統，而復所更以近溪「孝弟」契合鄉約，為「憲章高皇處」。⁹⁰ 所以萬曆十六年楊起元於近溪的墓誌銘提到「皇明會合貞元，篤生夫子，揭日中天，信性信古，巧力具全，大信大順，仁孝自然，祖述仲

⁸⁴ 耿定向，《耿天臺先生文集》，卷 11，頁 290-292。

⁸⁵ 陳時龍，〈師道的終結——論羅汝芳對明太祖《六諭》的推崇〉，《明史研究論叢》，10（北京：2012），頁 245-253。

⁸⁶ 楊起元，《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0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5，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余永寧刻本），卷 2，頁 312-314。

⁸⁷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2017），頁 8。

⁸⁸ 陳時龍，〈聖諭的演繹：明代士大夫對太祖六諭的詮釋〉，《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3.5（合肥：2015），頁 614-617。

⁸⁹ 趙志皋，〈刻會語續錄序〉，收入羅汝芳撰，耿定向、楊起元點評，《耿中丞楊太史批點近溪羅子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30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刻本），頁 258。

⁹⁰ 羅汝芳，《耿中丞楊太史批點近溪羅子全集》，《近溪子續集·會語續錄》，卷上、下，頁 268-288。

尼，憲章高皇，覆幬靡遺，持載無疆，物斯並育，道亦並行」，⁹¹ 但當時並未與《御製文集》相關。

這一情況直至萬曆二十年前後出現轉變，《明儒學案·許孚遠傳》提到「南都講學，先生與楊復所、周海門為主盟。周、楊皆近溪之門人，持論不同。海門以無善無惡為宗，先生作《九諦》以難之」，⁹² 可見復所、海門陷入與許孚遠的講學論爭，且更被批評為「出入二氏」，⁹³ 故復所早於萬曆十九年與葉夢熊（1531-1591）的〈葉龍老〉提到「我太祖高皇帝所以為天挺聖神也，其論三教曰：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常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給濟之理一。世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大哉皇言，聰明睿智達天德矣」，即引《御製文集》的〈三教論〉支持其觀點。⁹⁴ 而萬曆二十四年的〈管東溟〉更進一步將太祖的三教合一論直接道統，關鍵則正是《御製文集》的〈還經示僧〉、〈諭僧〉與〈道患〉三篇：

近日理會得宇宙間一件大事。此道之統，自堯舜湯文孔子而來幾二千年至我高皇直接之，無纖毫不滿之遺憾。飛龍御天，作用人所知也。至其成就淵微處，人未之知也，具在文集〈還經示僧〉篇，又〈諭僧〉篇，又〈道患〉篇。試取三製讀之，可以測其精微之蘊矣。弟至愚拙，自謂此舉庶乎少裨於世。近摘數篇稍為詮釋，刻之本部，以示同志。須風行之後，表其全書，無不妙者也。刻尚未脫板，容寄上方生行。先此寄音及冬日記一冊，內有送孫欽齋先生序具之，敢祈覽教。⁹⁵

故此復所於萬曆二十五年刊刻《御製文集》的同時更以《訓行錄》分上、中、下卷，詮釋《御製文集》其中六十九篇詔、諭、敕、誥、序等內容，以煥發其論

⁹¹ 同前引，《近溪子附集》，卷 2，〈明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明德夫子羅近溪先生墓誌銘〉，頁 247。

⁹² 黃宗羲，《明儒學案（修訂本）》下冊，卷 41，〈甘泉學案五·許孚遠〉，頁 973。

⁹³ 楊起元，《續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67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天津圖書館藏明楊見峻等刻本），卷 7，〈復許敬菴〉，頁 331。

⁹⁴ 楊起元，《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卷 2，頁 315。

⁹⁵ 楊起元，《續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 7，頁 326-327。

說。⁹⁶ 楊本刊刻無疑令「憲章高皇」從六論「孝慈弟」轉為《御製文集》三教合一，成為晚明三教合一論爭的討論資源，因而令其在學術上的意義變得更為重要。

晚明三教合一論爭無疑因陽明學而起，但王門內部即使同為三教合一支持者的立場、理解亦不盡相同。⁹⁷ 因此《御製文集》於三教合一的論爭是多元而不同，既有泰州王門亦有反對王學者逕自解讀，但都證明《御製文集》因王學而深契於此。顧憲成、高攀龍 (1562-1626) 以王學修正自居，⁹⁸《高子遺書》的〈答涇陽論猶龍一語〉亦引《御製文集》中〈三教論〉的「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討論習佛誤道之弊。⁹⁹ 顧憲成亦引〈御製心經序〉謂「闡色空義最精，謂善用之，可治天下。曷嘗詆禪之悖儒。至其頒行天下，必以五經四書及程朱之訓註，則所主又自有，在吾儕今日唯有體聖祖之意，挽風會之流」，¹⁰⁰ 可見顧認為太祖雖攝三教，但並不偏離儒學。是故，顧於〈再與管東溟書〉回應王門三教合一主將管志道 (1536-1608) 的「祖述仲尼，憲章高皇」亦提「又嘗讀《御製文集》知佛氏之道，聖祖最得其深。乃其治天下，惟是尊事孔子，士子所習惟五經四書及程朱諸大儒集註」。¹⁰¹

而同屬泰州王門焦竑 (1540-1620) 的門人陳懿典 (1554-1638) 也引《御製文集》反對「三教合一」。¹⁰² 其於〈陸開仲四書傳翼敘〉指朱子之學「主敬窮理，尺尺寸寸，以防二氏之竄入」，所以太祖以朱子學取士故能「制科得人」，並批評「末學小生輩，動輒稱引佛乘，自立門戶」以表揚陸開仲《四書傳翼》「以經為主，以傳為翼」有「揚榘考亭之緒，而上討於孔氏之正傳」之功。¹⁰³ 而陳於〈壽

⁹⁶ 楊起元於《訓行錄》的序與〈管東溟〉分別提到「限於時日，未及全釋，姑存而附刻焉」、「自近摘數篇稍為詮釋刻之本部，以示同志，須風行之後，表其全書」足見其並未以《御製文集》構成三教合一的討論焦點。楊起元，《訓行錄》（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序刊本），〈序〉，無頁碼。

⁹⁷ 魏月萍，《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論述》（臺北：聯經出版，2016），頁 56-57、263-266；劉曉東，〈「三教合一」思潮與「三一教」——晚明士人學術社團宗教化轉向的社會考察〉，《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長春：2002），頁 21-27。

⁹⁸ 姚才剛，〈論顧憲成對王學的修正〉，《鵝湖月刊》，357（新北：2005），頁 46-51。

⁹⁹ 高攀龍，《高子遺書》，《四庫全書》集部第 129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8 上，頁 471。

¹⁰⁰ 顧憲成，《顧端文公遺書》，《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94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證性編》，卷 5，〈質疑上·與管東溟書〉，頁 317-318。

¹⁰¹ 同前引，卷 6，頁 328。

¹⁰² 陳顯哲，《博學與考據：焦竑對陽明心學的修正》（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論文，2016），頁 151。

¹⁰³ 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78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曹憲來刻本），卷 1，頁 641-642。

丘增城六袞序〉引〈心經序〉的「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嘗有之。為人性貪而不覺」謂「為國君及王侯者，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乎」，再次批評佛門。¹⁰⁴

但另一邊廂，同是泰州王門的李贄則於〈三教品序〉提到：

三教聖人，頂天立地，不容異，同明矣。故曰：天下無二道，聖賢無兩心。我高皇帝統一寰宇，大造區夏。其敬孔子，敬老子，敬釋迦佛，有若一人。然其《御制文集》，凡論三教聖人，往往以此兩言斷之，以見其不異也。夫既謂之道，謂之心矣，則安有異哉？則雖愚夫愚婦以及昆蟲草木，不能出此道此心之外也，而況三教聖人哉？蓋非不欲二，雖欲二之而不得也。非不欲兩，雖欲兩之而不能也……一以高皇帝為師，以高皇帝之謨訓為律，乃觀場矮子侮聖言不遵，棄謨訓不目，非毀老佛，輕詆仙釋，唯勦襲胡元穢說，雷同宋末庸見。是生今反古，居下倍上，大戮之民也。故因敬讀高皇帝、文皇帝御製文集，錄之以為三教品。嗚呼，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是書明白切至如此。¹⁰⁵

可見李贄雖同引〈三教論〉的「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但卻以「其敬孔子，敬老子，敬釋迦佛，有若一人」而站於支持三教合一的一方。而與楊起元於《孝經》的觀念、實踐相近的虞淳熙（1553-1621）亦於《虞德園先生集》的〈書猿洞賓傳後〉引〈三教論〉。¹⁰⁶

可見，晚明諸儒熱切地以《御製文集》討論三教合一，即使是同屬泰州王門亦會引《御製文集》表達截然不同的看法，更枉論反對王學者。而他們更會逕自徵引、解讀或詮釋《御製文集》，所以楊起元等無須改變《御製文集》以表達己見，故此才有《訓行錄》。而這些皆證明楊本的刊刻是促成《御製文集》捲入晚明三教合一論爭的關鍵，同時更令泰州王門與《御製文集》關係變得千絲萬縷。萬曆三十九年（1611）至四十三年之間，服膺王良的謝正蒙更與時任整飭揚州兵備副使的熊

¹⁰⁴ 同前引，卷4，頁24-25。

¹⁰⁵ 李贄，《李溫陵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5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明刻本），卷10，頁144。

¹⁰⁶ 虞淳熙，《虞德園先生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4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未刻本），卷21，頁478；呂妙芬，〈晚明《孝經》論述的宗教性意涵：虞淳熙的孝論及其文化脈絡〉，《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8（臺北：2005），頁1-46。

尚文刊刻了明代最後一個《御製文集》的版本，這亦說明了晚明《御製文集》的刊刻自始至終都離不開講學，足見其影響之流及。¹⁰⁷

而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其實除了前述《嘉靖惟揚志》提到《御製文集》藏於甘泉山書館的仰宸樓外，《萬曆嘉定縣志》亦提到設於嘉靖十六年（1537）的尊經閣，於萬曆三十一年由教諭王善繼增入《御製文集》，而尊經閣不僅藏有《御製文集》，且有《石經大學》等深契晚明學術論爭的典籍，¹⁰⁸ 所以這不獨為舉業之用，而是具講學論道的意味。即使嘉靖、萬曆《御製文集》的刊刻背景不一，但其發展趨向卻是一致的，《御製文集》已由敕撰書變成士子的讀本，並深契於晚明的學術思想。但是與嘉靖不同的是，萬曆特別是中後期《御製文集》的刊刻，是契合於泰州王門而非甘泉門下。而這股潛流更是復所從近溪承接，由六論「憲章高皇」轉為以太祖三教合一上接「此道之統，自堯舜湯文孔子而來幾二千年至我高皇」，自此《御製文集》更深契於泰州王門與三教合一的論爭並不限於《大學》的講學。

四、《御製文集》的版本與史料價值

嘉靖、萬曆《御製文集》的刊刻無疑是嘉靖「法祖講學」的背景所觸發，湛若水更使其與晚明講學變得密不可分，這亦是《御製文集》多次於南都一帶刊刻的緣由。但值得考慮的是，這些講學背景或是學術主張是否影響《御製文集》的內容以至其史料價值。

（一）嘉靖的復刻與重編

嘉靖八年唐胄雲南刻本僅比明初本缺〈祭小張國公〉、〈祭江陵侯吳良〉及

¹⁰⁷ 清人李顥於《二曲集》提到巡鹽御史謝正蒙於王良「相繼置田肖像表章私淑」。李顥，《二曲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1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高爾公刻後印本），卷 22，〈觀感錄·心齋王先生壘丁〉，頁 330-334；吳穎，《順治潮州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善本方志類第二編第 52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清順治十八年（1661）刻本），卷 6，〈惠來縣·謝御史傳〉，頁 229；曾之亨，《乾隆安鄉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南府縣志輯第 74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清光緒六年（1880）盛賡補刻本），卷 8，〈通考志〉，頁 464；張惟賢，《明神宗實錄》，卷 534，「萬曆四十三年七月癸丑」條，頁 10104。

¹⁰⁸ 韓浚、張應武等纂修，《萬曆嘉定縣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08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上海博物院藏明萬曆刻本景印，1966），卷 3，〈營建考上〉，頁 708；劉勇，《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頁 113-116。

〈祭孔希學〉三篇祭文，故可視為明初本的復刻版，但其意義在於打破「御製」性質使其流通於世，並為往後《御製文集》刊刻掀起序幕。嘉靖十四年徐九皋、王惟賢的江都刻本正是以唐本為底本，故徐於〈後序〉提到：

會提學御史臣聞人誣以滇本遺臣，謂宜重鈐諸梓。臣乃檄江都知縣王惟賢刻焉。惟賢復搆得甲、乙、丙、丁四集，間多前集所未登錄。蓋當時侍從文學之臣各自纂記，以故編次不倫。臣乃躬自讐校，互相補除，合六百七十二篇，仍分為二十卷。¹⁰⁹

所謂「滇本」亦即唐本。但徐本不純是重刻唐本，而是補入王惟賢「復搆得甲、乙、丙、丁四集」。所謂「甲、乙、丙、丁四集」即《百川書志》提到的《御製文集》三十卷本。¹¹⁰ 再加上，徐本〈後序〉又提到「翰林學士臣樂韶鳳等輯高皇帝詩文五卷，近滇南刻本二十卷，卷目不與韶鳳等輯同」與劉基的序文相合。¹¹¹ 但劉基的序文其實未見於明初本或是唐本，反而見於南京圖書館藏《御製文集》的三十卷本，所以可肯定王惟賢輯入的是三十卷本。

此外，三十卷本亦輯有不少與明初本相同的篇目如〈敕問文學之士〉、〈問佛仙〉、〈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敕〉與〈命御史審決罪囚〉。若比較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殘本中〈丙集〉的卷十至十四，則見〈諭僧純一〉、〈問聖學〉、〈問天時〉、〈問刑賞〉、〈問堯舜禹啟〉、〈問天地鬼神〉、〈問人臣言行〉、〈明施論〉、〈宦釋論〉、〈修教論〉、〈蘭亭流觴曲水圖記〉、〈夏日雨晴詩序〉、〈秋宇澄清說〉、〈晴鳶搏風說〉、〈堯湯水旱說〉、〈黃河說〉、〈良馬說〉、〈生擒虎說〉、〈牛搏虎說〉、〈唐太宗出獵圖贊〉、〈毗沙門天王贊〉、〈題徐熙暮雪雙禽圖〉、〈題李嵩西湖圖〉等均與明初本相同，¹¹² 無怪徐、王並未質疑三十卷本的真確性。是故，徐、王於唐本之上輯入大量三十卷本的內容：詔兩篇、誥兩篇、敕二十篇、策問四篇、論五篇、歌一首、文兩篇、記四篇、序十篇、說十六篇、雜著三十篇、祭文四篇、古詩十三首、歌行四首、五言律詩兩首、五言排律一首、七

¹⁰⁹ 《高皇帝御製文集》（徐本），頁 6a-b。

¹¹⁰ 李根利，〈《明太祖文集》版本考〉。

¹¹¹ 「御製文集五卷，論、記、詔、序、詩文凡若干篇，翰林學士臣樂韶鳳、宋濂等之所編錄」。《高皇帝御製文集》（徐本），頁 1a。

¹¹² 《御製文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卷 10，頁 1a-2b、8b；卷 11，頁 1a-15b；卷 12，頁 1a-6a、5b-9a；卷 13，頁 1a-3a、7b-9a；《明太祖御製文集》，卷 8，頁 267-269；卷 11，頁 331-337；卷 16，頁 362-371；卷 17，頁 463-466、476-497；卷 18，頁 514-515、542-544。

言律詩四十首、七言絕句五十二首及序文。¹¹³ 李根利透過考證刻工身分指出三十卷本刊刻於洪武中後期。¹¹⁴ 徐本將明初本復刻版的唐本與三十卷本彙編，無疑是整合了洪武時代的兩類《御製文集》版本系統。

雖然如此，但隨著三十卷本的內容大量編入，特別是古詩、歌行、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律詩與七言絕句等過往未有之體裁，而徹底改變《御製文集》的結構。本來卷十九、二十為祭文，但為了補入詩文內容，分別改成古詩、五言律詩等。卷八、九的敕與卷十四、十五的文更各濃縮成一卷，以騰出空間編入詩文。而這一改動徹底改變了《御製文集》的編排結構，雖便於讀者，但稍有不慎則遺誤後世，如從三十卷本輯入的〈下竺寺住持字說〉其實是與〈僧道竺隱說〉相同。¹¹⁵ 但徐九皋、王惟賢並未注意到這一點，一直到萬曆末年才為謝正蒙、熊尚文更正。而更為重要的是徐本的改動破壞了明初的編纂原意，三十卷本的〈丙集〉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殘本的卷十三、十四，是刻意分為釋類、道類。但徐本按體裁輯入，無疑是破壞了這分類，並開了極壞的先例。唐胄雖將《御製文集》刊刻而打破敕撰的性質，但未敢改動內容。然而徐、王卻擅自改動了太祖的「御製」文集。

但無論如何，嘉靖八年唐胄的雲南刻本令《御製文集》得以再現，並流通士林。而嘉靖十四年徐九皋、王惟賢更以此為底本，輯入明初三十卷本，整理了明初各《御製文集》。因此徐本撇除改變結構外，依然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

(二) 萬曆的混雜與失誤

萬曆十年 (1582)，姚士觀、沈鈇於鳳陽再度刊刻《御製文集》。而姚氏更於目錄後的序文提到「是集曩刻之維揚，迺中都為聖祖龍興之邦，繫獨缺焉。偶于年友沈鈇氏獲睹舊本，持以歸之署中，炳蕭盥沐，跪誦數遍，祇覺聖謨洋洋盈耳，忘倦也。是用侍史染翰，刷人供役，冀與都人士共焉」，¹¹⁶ 維揚舊本亦即徐本。而胡士萼、李根利對比兩個版本，發現除多出一些篇章外，則幾乎完全相同。但問題是姚士觀、沈鈇所增補的內容是出於何處？是否可信？

¹¹³ 無論臺灣學生書局的明初本或是唐本均未見宋濂、郭傳、劉基後序，僅徐本始見此三篇後序。而李根利指出南京圖書館所藏的《御製文集》三十卷殘本，亦刊有劉基的〈御製文集後序〉。因此徐本的宋濂、郭傳、劉基的序文，應是來自三十卷本。

¹¹⁴ 然而除李根利提到楊茂、沈昌、林壽、陳濟、朱信、孫福與林祥等六位外，曹文暹、趙良亦見於明初的刻本，前者參與《華夷譯語》的刊刻，後者則參與《說苑》的刊刻。李根利，〈《明太祖文集》版本考〉；瞿冕良編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增訂本）》（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頁 617、796。

¹¹⁵ 《高皇帝御製文集》（徐本），卷 15，頁 32a-b、39a-b。

¹¹⁶ 《高皇帝御製文集》（姚本），〈目錄〉，頁 38b。

姚本多出的十八篇內容，除〈祭署令劉英文〉、〈新月〉、〈接樹〉、〈示僧謙牧〉四篇尚未能確實出處外，其餘可追溯如表一：

表一：萬曆十年《御製文集》增補篇章出處簡表

| 萬曆十年《御製文集》增補篇章 | | 來源出處 |
|----------------|-----------------------|----------------------|
| 1 | 卷八〈賜平涼縣尹王軫父諭〉 | 《水東日記》 |
| 2 | 卷十五〈解夷狄有君章說〉 | 《天順日錄》 |
| 3 | 卷十五〈解攻乎異端章說〉 | 《天順日錄》 |
| 4 | 卷十六〈江流賦〉 | 《皇明英烈傳》 |
| 5 | 卷十八〈祭署令劉英文〉 | 未明 |
| 6 | 卷二十「五言律詩」〈題扇示胡日星〉 | 《近峯聞略》 |
| 7 | 卷二十「七言律詩」〈早行〉 | 《草木子》 ¹¹⁷ |
| 8 | 卷二十「七言律詩」〈新月〉 | 未明 |
| 9 | 卷二十「七言律詩」〈賜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 | 《遵聞錄》 |
| 10 | 卷二十「七言律詩」〈接樹〉 | 未明 |
| 11 | 卷二十「五言絕句」〈咏雪竹〉 | 《遵聞錄》 |
| 12 | 卷二十「七言絕句」〈咏菊花〉 | 《七修類稿》 |
| 13 | 卷二十「七言絕句」〈示僧謙牧〉 | 未明 |
| 14 | 卷二十「七言絕句」〈征陳至瀟湘〉 | 《遵聞錄》 |
| 15 | 卷二十「七言絕句」〈不惹菴示僧〉 | 《一統肇基錄》 |
| 16 | 卷二十「七言絕句」〈咏虹霓〉 | 《碧里雜存》 |
| 17 | 卷二十「續增七言律詩」〈采口磯新秋月色〉 | 《皇明英烈傳》 |
| 18 | 卷二十「續增七言律詩」〈賜劉伯溫〉 | 《皇明英烈傳》 |

由於姚士觀、沈鈇的著作均已散佚，再加上跋文並未提及出處來源。故此只能透過對比不同典籍，以推敲這些內容的來源。就目前所知可分為直接、輾轉抄錄兩類。

¹¹⁷ 陳衍 (1856-1937) 於《元詩紀事》引《月山詩話》指太祖這首〈早行〉是出自元文宗 (圖帖睦爾, 1304-1332, 在位 1328-1329, 1329-1332) 於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所作的詩句, 不知何故被竄易十數字, 並輯入太祖文集。他更指出這可追溯至《草木子》。然而《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其實亦輯有類似的〈早行〉詩句, 所以這或為《草木子》抄錄所流出。陳衍, 《元詩紀事》, 《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710 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浙江圖書館藏清光緒鉛本), 卷 1, 頁 66; 葉子奇, 《草木子》 (北京: 中華書局, 1997), 卷 4 上, 〈談藪篇〉, 頁 72;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內府鈔本善本書膠卷), 卷 20, 頁 43b。

1. 直接抄錄

卷八〈賜平涼縣尹王軫父諭〉無疑是出自《水東日記》，對比兩者則發現除了《御製文集》刪去抬頭、背景外，僅有些微差異，如「管勾」誤為「管局」、「其里長弓兵」誤寫為「里長其弓兵」、「私于權門」刻成「私干權門」。吳元年(1367)設立的御史臺有「管勾」一職而無「管局」，《吳興藝文志》中的〈獎王軫之父王升詔〉除「里長其弓兵」外則與《水東日記》完全相同，可見這顯然為輯錄之誤。¹¹⁸ 而且又因刪去抬頭，而誤將此詔書當為諭書。《水東日記》在此詔前提到「《五倫書》已載有王軫家書事，以示勸萬世矣。軫，嘉興人也，嘗詢得之。今恭錄詔文於此，次謝表，終家書焉」，而考之宣宗（朱瞻基，1399-1435，在位1425-1435）御撰《五倫書》確有提及，足證《水東日記》所言非虛。¹¹⁹ 當中提到此詔是從王軫「嘗詢得之」，而這一點更可從《明太祖實錄》佐證，足見此詔並非偽造。¹²⁰ 但值得注意的是，若對比此詔與《明太祖實錄》，則發現雖然文意相通，但用詞、文句不一。《水東日記》顯然是經過潤飾，而《明太祖實錄》提到為「賜升手詔」，故此實錄所載的應是太祖手詔，《水東日記》則是經過文臣潤飾才頒發給王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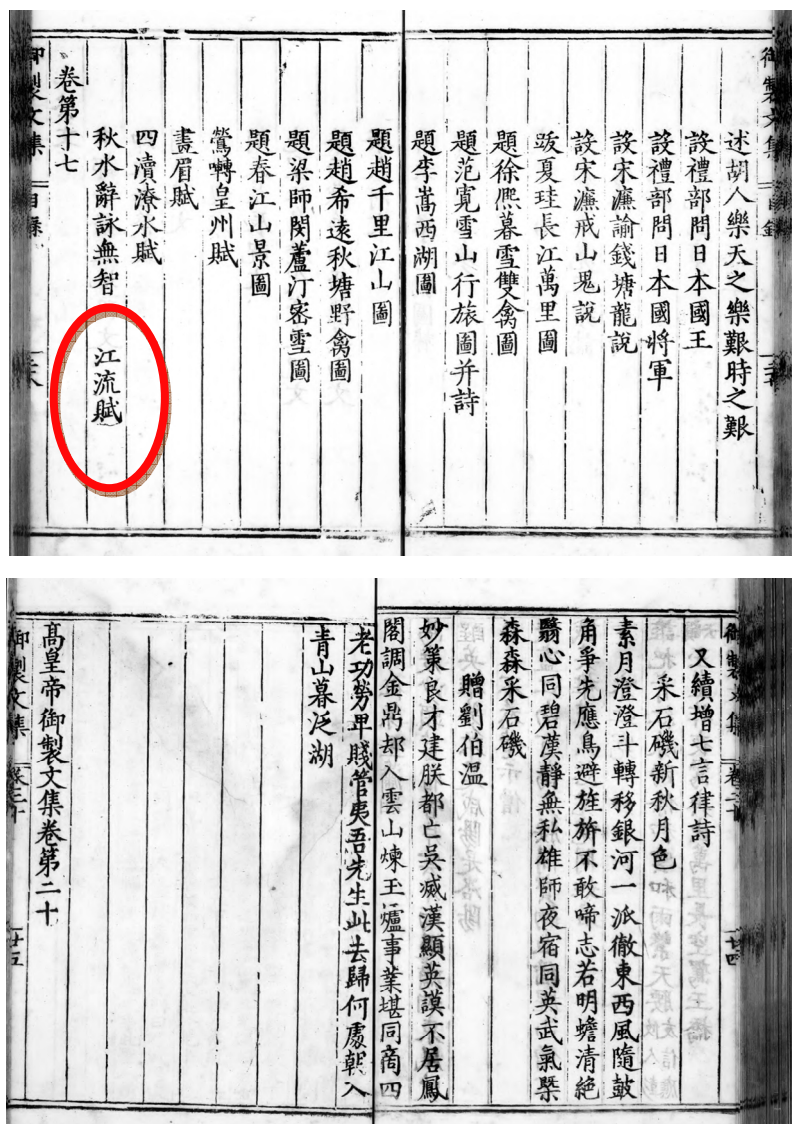
卷十六〈江流賦〉與卷二十續增七言律詩〈采石磯新秋月色〉、〈賜劉伯溫〉應來自郭勛《皇明英烈傳》。《皇明英烈傳》雖亦輯有〈賜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但目錄上〈采石磯新秋月色〉、〈賜劉伯溫〉則是編入續增七言律詩（如圖二所示），並排在七言絕句之後，似是編輯完成後補入，有別於已編入七言律詩的〈賜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¹²¹ 〈江流賦〉在目錄上排於〈秋水辭詠無智〉之下，而非獨立一行（如圖一所示）。可見，〈江流賦〉與〈采石磯新秋月色〉、〈賜劉伯溫〉應在初稿後輯入，故目錄編排上較為突兀，反映三篇出自同源。而目前所知僅《皇明英烈傳》載此三篇，若再比較兩者則更一目瞭然，特別是〈采石磯新秋月

¹¹⁸ 夏原吉，《明太祖實錄》，卷 26，「吳元年十月壬子」條，頁 385-387；董斯張，《吳興藝文補》，《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7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明崇禎六年刻本），卷 29，頁 64。

¹¹⁹ 葉盛，《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11，〈記王軫父家書事〉，頁 115；明宣宗，《五倫書》，《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93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明正統十二年內府刻本），卷 54，〈父道·嘉言〉，頁 280。

¹²⁰ 李景隆，《明太祖實錄》，卷 63，「洪武四年閏三月是月」條，頁 1210。

¹²¹ 郭勛，《皇明英烈傳》，《古本小說集成》第 20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 6，〈沐英三戰克雲南太祖一統平天下〉，頁 535-536。



圖一、二：《高皇帝御製文集》（沈本）目錄頁、卷二十末頁

色〉、〈賜劉伯溫〉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¹²² 相較之下，姚本的〈江流賦〉只是錯字較多，如將「滴溜上風」改為「滴溜溜風」、「孤聳上」改為「孤聳聳」、

¹²² 〈采石磯新秋月色〉僅「心同碧海」改為「心同碧漢」；〈賜劉伯溫〉的「卻向雲山」改為「欲入雲山」，「此去居向」改為「此去歸何」。《高皇帝御製文集》（姚本），卷 20，頁 24b-25a；郭勛，《皇明英烈傳》，卷 2，〈高皇帝采石吟詩太平城陶安獻策〉，頁 103；卷 6，〈劉伯溫辭爵歸山沐文英貴州大戰〉，頁 524。

「白沙鶴」誤為「向沙鶴」、「五馬化為龍」誤為「五馬一為龍」、「蓮江做放」誤為「芰生荷放」、「碧蒲蒲碧」易為「碧荷荷碧」、「焚鉢鎖」易為「焚鎖鍊」，又刪「曹操」、「符堅」等小字。¹²³ 姚本雖是抄錄《皇明英烈傳》，但卻有脫字、錯字等問題。但更為重要的是，《皇明英烈傳》作為明中葉的小說，早已被沈德符 (1578-1642)《萬曆野獲編》批評其史料價值。¹²⁴ 而姚本卻謬然以為太祖御撰而輯入，實極不恰當。

其三，卷二十的五言絕句〈咏雪竹〉、七言絕句〈征陳至瀟湘〉、七言律詩〈賜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則應是出自梁億《遵聞錄》，前兩首的記載與《遵聞錄》接近完全相同。¹²⁵ 而〈賜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一首，則只有「馬鳴甲冑乾坤靜」易為「雷鳴甲冑乾坤靜」，「世上麒麟終有種」輯為「世上麒麟真有種」兩處不同。¹²⁶ 但這首詩的可信性，王世貞 (1526-1590) 早於〈史乘考誤〉質疑為宋代「哲宗送大將征夷」的故事，再加上「太祖製集無之」以為是「野人之談三變」而不足信。¹²⁷ 而沈德符更謂「乃不自揆，僭稱『傳信』……庸妄人自名為信，他人何嘗信之」。¹²⁸

2. 輾轉抄錄

姚本部分內容，其實可追溯至更早的出處，但編集時卻引用了轉抄的文本，造成輾轉失載。卷十五的〈解夷狄有君章說〉與〈解攻乎異端章說〉則應是出自李賢 (1408-1466)《天順日錄》，當中提到太祖與儒臣就進講《論語》時，針對宋儒「夷

¹²³ 《高皇帝御製文集》(姚本)，卷 16，頁 51a-52b；郭勛，《皇明英烈傳》，卷 3，〈伯溫計破陳友諒興祖大戰采石磯〉，頁 236-240。

¹²⁴ Martin W. Huang, "Sage, Hero and Bandit: Zhu Yuanzhang's Imag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ovel Yingle Zhuan," in Sarah Schneewind (ed.), *Long Live the Emperor! Uses of the Ming Founder across Six Centuries of East Asian History* (Minneapolis: Society of Ming Studies, 2008), pp. 137-148.

¹²⁵ 《高皇帝御製文集》(姚本)，卷 20，頁 24b；梁億，《遵聞錄》，收入鄧士龍編，許大齡、王天有點校，《國朝典故》中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卷 62，頁 1424、1426。至於《損齋備忘錄》雖亦載有〈征陳至瀟湘〉，但只見於《古今說海》本，而且其載「馬渡溪頭」與「陳風吹醒英雄夢」均與《御製文集》有異，而《遵聞錄》僅「片雲片雨渡瀟湘」與《御製文集》「片雲片雨過瀟湘」不同，所以《御製文集》應是抄自《遵聞錄》。

¹²⁶ 《高皇帝御製文集》(姚本)，卷 20，頁 14a；梁億，《遵聞錄》，收入鄧士龍編，《國朝典故》中冊，卷 62，頁 1427。

¹²⁷ 王世貞，《弇州史料後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5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卷 68，〈史乘考誤·二史考乘八〉，頁 414。

¹²⁸ 陳學霖，《明代人物與傳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7)，頁 10-11。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與「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而提出的「三辯」。〈解夷狄有君章說〉與〈解攻乎異端章說〉則是從前兩者衍生而成，但《御製文集》卻未有輯錄第三辯。

當然這並不是姚本刻意略去第三辯，而是它引錄了類近弘治十六年(1503)婁性《皇明政要》的記述。¹²⁹《皇明政要》主要是從「大學士李賢曰」抄錄了首兩條，與《天順日錄》大抵相同，差別僅在於略去第三辯。¹³⁰

但姚本在抄錄〈解夷狄有君章說〉時，似乎抄錄比《皇明政要》更差的版本，不僅用字不一，甚至乎扭曲原意。姚本載「夷狄，禽獸也，故孔子賤之，以為彼國雖有君長，然不知君臣之禮，上下之分，爭鬥紛然。中國縱亡君長，必不如此。是其有君曾不如諸夏之亡也。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¹³¹但原文應為「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之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¹³²首先《天順日錄》的「三辯」都是用「孔子之意」而〈解攻乎異端章說〉亦是用「孔子之意」，故此〈解夷狄有君章說〉記「孔子賤之」則是有違本意。再者，《天順日錄》原文指孔子認為「夷狄」是「禽獸」是因為「無仁義禮智之道」，而中國因知禮義，縱使無君長亦比夷狄有君長好。但姚本則是「因果倒置」開頭明言「夷狄」就是「禽獸」所以為「孔子賤之」，因此他們不知君臣之禮、上下之分，所以「有君曾不如諸夏之也」。可見，《天順日錄》的記載早已於弘治前後被《皇明政要》等抄錄轉載，而出現失載的情況，但姚本卻引錄這些轉抄的版本，終致文句不一，扭曲原意。

卷二十的五言律詩〈題扇示胡日星〉與七言絕句〈不惹菴示僧〉亦可追溯至皇甫錄《近峯聞略》與夏原吉《一統肇基錄》，但《御製文集》則顯然抄錄自郎瑛《七修類稿》而非原書。〈題扇示胡日星〉是從記述中節輯而成，因此誤將「劉日新」記為「胡日星」，而此誤更一直延續。《近峯聞略》原載為「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但至《七修類稿》時已變為「有一老古叟，胸中羅星斗，許朕作君

¹²⁹ 婁性，《皇明政要》，《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2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五年戴金刻本），卷1，〈道問學第二〉，頁14。

¹³⁰ 當中只有一句「蓋謂中國之無君長」與「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不同。同前引，〈尊德性第一〉，頁14；李賢，《天順日錄》，收入鄧士龍編，《國朝典故》中冊，卷48，頁1143-1144。

¹³¹ 《高皇帝御製文集》（姚本），卷15，頁54b-55a。

¹³² 李賢，《天順日錄》，收入鄧士龍編，《國朝典故》中冊，卷48，頁1143。

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願，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天下橫行走。」《御製文集》與《七修類稿》相較，只是將句末易為「四海遂行走」。¹³³ 至於〈不惹菴示僧〉出於《一統肇基錄》太祖微服南昌訪寺的故事，其載「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流腥，野僧不識山河主，只個滔滔問姓名」，而《七修類稿》已變為「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主，只故嘵嘵問姓名」，姚本將「英雄主」變為「英雄漢」、「只故」變為「只恁」大致與《七修類稿》無異。¹³⁴ 而從「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改為「有一老古叟，胸中羅星斗」則見《七修類稿》在轉抄《一統肇基錄》的過程已委曲原文，姚本卻沿襲《七修類稿》。但在抄錄時又將「般若庵」誤記為「不惹菴」可見幾層傳抄之誤。再者，陳學霖曾指出《一統肇基錄》並不可信，諸如其載太祖因黃月清「國號改元」而不廢道教之說乃子虛烏有。¹³⁵ 故此，不僅傳抄之誤，其來源亦值得商榷。若〈題扇示胡日星〉與〈不惹菴示僧〉皆出自《七修類稿》，卷二十的七言絕句〈咏菊花〉則應同是出自《七修類稿》，唯其載「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前半部分「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組合起來亦只有六字，並不應為七言絕句，唯《御製文集》〈咏菊花〉則加入「時」一字，使其變為「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這顯然為了配合「七言」而有的改動。¹³⁶ 最後，〈咏虹霓〉最早的出處或來自董穀《碧里雜存》，而此詩更於明中葉廣泛流傳，無論廖道南《楚紀》、陳建《皇明通紀法傳全錄》、雷禮《皇明大政紀》均有輯錄。¹³⁷

¹³³ 皇甫錄，《近峯聞畧》，《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40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5，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古今名賢彙語本），頁 102；郎瑛，《七修類稿》，《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2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卷 13，〈國事類〉，頁 99；《高皇帝御製文集》（姚本），卷 20，頁 1b。

¹³⁴ 夏原吉，《一統肇基錄》，《稗乘》第 1 函第 4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頁 5；郎瑛，《七修類稿》，卷 37，〈般若庵〉，頁 258；《高皇帝御製文集》（姚本），卷 20，〈不惹菴示僧〉，頁 24a。

¹³⁵ 陳學霖，《宋明史論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頁 163。

¹³⁶ 郎瑛，《七修類稿》，卷 37，〈菊花詩〉，頁 259-260；《高皇帝御製文集》（姚本），卷 20，頁 23b。

¹³⁷ 董穀，《碧里雜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40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5，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堂祕笈本），〈彭友信〉，頁 137；廖道南，《楚紀》，《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7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明嘉靖二十五年李桂刻本），卷 42，〈考履內紀後篇〉，頁 662；陳建，《皇明通紀法傳全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35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九年刻本），卷 9，〈高皇帝〉，頁 164；雷禮，《皇明大政紀》，《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35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博古堂刻本），卷 4，頁 442。

姚本去脈絡化的摘取，使篇章失去語境，歪曲原意，〈賜平涼縣尹王軫父諭〉更誤將詔以為諭，〈題扇示胡日星〉誤當「劉日新」成「胡日星」，〈不惹菴示僧〉中的「不惹菴」其實是「般若菴」。而抄錄過程中又有不少遺漏，特別是〈江流賦〉亦有不少錯字。更有甚者，〈題扇示胡日星〉、〈不惹菴示僧〉等取材自輾轉抄錄而成的《七修類稿》，而非《近峯聞略》、《一統肇基錄》等更早的來源，相去甚遠。〈解夷狄有君章說〉與〈解攻乎異端章說〉源出《天順日錄》，但卻輯錄類近於《皇明政要》的記載，不僅內容失真，且字詞改易，如「孔子賤之」等更是委曲原意。但可惜的是，往後的楊起元、謝正蒙等都未注意到這些問題，而延續了姚本的遺誤，特別是楊本更是照姚本複刻。謝本雖已更正〈下竺寺住持字說〉的重複，且又重新將「又續增七言律詩」的〈采石磯新秋月色〉、〈賜劉伯溫〉兩首輯入七言律詩，並將五言絕句排在七言絕句之後，令編排上更為合理，但始終無法彌補缺憾。這些都使《御製文集》作為明太祖研究的史料價值大打折扣，而日後引用更應謹慎。

(三)《御製文集》的史料價值與意義

雖然如此，唯明中後期《御製文集》刊刻的意義在於改變其敕撰書性質，使之流通於士林。特別適逢嘉靖「法祖講學」所引起的「開國史」風潮，使之作為史料構築晚明以降對明初史事的論述。晚明汪廣洋(?-1379)論述的改變，正是《御製文集》的貢獻。汪廣洋於《明太祖實錄》中提為「坐事貶海南，死于道」，而且是由於汪廣洋在被貶途中得太祖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¹³⁸而其後的《皇明泳化類編》、《國朝列卿記》與《國朝獻徵錄》亦是沿襲此官方說法。¹³⁹王世貞則正是引用《御製文集》的〈廢丞相汪廣洋〉指出當中太祖嚴斥汪廣洋「坐視興廢」及「與楊憲同署於中書，憲姦惡萬狀，爾匿而不言」，因而「特賜敕以刑之」並「差人追斬其首」指出汪廣洋並非自縊亡，而是被太祖賜死，而修正明初的官方說法。自此晚明於汪廣洋之死的論述亦出現改變，《名山藏》、《明史竊》不僅載汪廣洋被賜死更輯錄了〈廢丞相汪廣洋〉，¹⁴⁰而《明史》更是以此為定案。¹⁴¹此外

¹³⁸ 夏原吉，《明太祖實錄》，卷128，「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是月」條，頁2035-2038。

¹³⁹ 鄧球，《皇明泳化類編》，《明代傳記叢刊》第80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卷49，〈人物〉，頁447；雷禮，《國朝列卿記》，《明代傳記叢刊》第32冊，卷1，〈中書省左右丞相行實〉，頁139。

¹⁴⁰ 何喬遠，《名山藏》，《明代傳記叢刊》第74冊，卷41，〈勳封記一〉，頁500；尹守衡，《明史竊》，《明代傳記叢刊》第82冊，卷31，〈李汪胡楊張陳列傳第九〉，頁299-300。

《皇明馭倭錄》更直接提到「近年南京禮部新刻《御製文集》未附詩百餘首，有〈賡僧錫仗歌〉而無賡宗泐詩」說明其出自萬曆二十五年楊起元的南京禮部刻本，並引〈設禮部問日本國將軍〉指明初使日為趙秩之功，而不應為「僧徒粉飾」。但錢謙益則恰恰是以《御製文集》的〈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詔〉作為反駁。¹⁴² 可見《御製文集》的刊刻作為史料，足以改變晚明於明初史事的構築。

但不幸的是，混入《皇明英烈傳》等小說稗史的姚本廣泛流傳，從而影響時人以至後世對太祖的研究。從《皇明政要》等輯入刪減的〈解夷狄有君章說〉與〈解攻乎異端章說〉，不僅使楊起元於《訓行錄》詮釋〈資世通訓序〉謂「即春秋尊中國之法，由後言之，即大易閑邪存誠之旨，宋儒見解所不及，非我高皇求異於宋儒也」，¹⁴³ 更使近人誤解太祖的民族觀、天下觀。¹⁴⁴ 此外，近人研究稍一不慎引用姚本誤植文本，更甚至乎曲解太祖其人的思想與文學修養，影響深遠。¹⁴⁵

五、結論

嘉靖法祖講學與禮制改革的背景下，不僅使祖訓契合學術思想，更引起士子熱切關注祖制，唐胄因而於嘉靖八年（1529）令《御製文集》「昭回寰宇」。湛若水《聖學格物通》以祖訓佐證「隨處體認天理」宗旨，令祖訓契合於晚明講學，使從學的徐九皋、王惟賢於嘉靖十四年再度刊刻。萬曆十年（1582），熱衷講學及《大學古本》的沈鈇與姚士觀於鳳陽重刊，成為影響最廣的版本。泰州王門的楊起元為反擊混雜禪學、出入二氏的批評，因而高舉太祖「三教理一」的旗幟，並於萬曆二十五年刊有《御製文集》及《訓行錄》以為聲援，而捲入晚明三教合一論爭。這一風氣一直延續至萬曆末年謝正蒙、熊尚文的最後一個刻本。嘉靖、萬曆《御製文集》的刊刻，毋寧反映晚明士人如何利用祖訓闡發其論學宗旨的新面向。

¹⁴¹ 張廷玉，《明史》第12冊，卷127，〈列傳第十五〉，頁3773-3774。

¹⁴² 王士驥，《皇明馭倭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卷1，頁285；錢謙益，《錢牧齋全集》第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牧齋初學集》，《太祖實錄辨証》，卷103，頁2121-2122。

¹⁴³ 楊起元，《訓行錄》，卷中，無頁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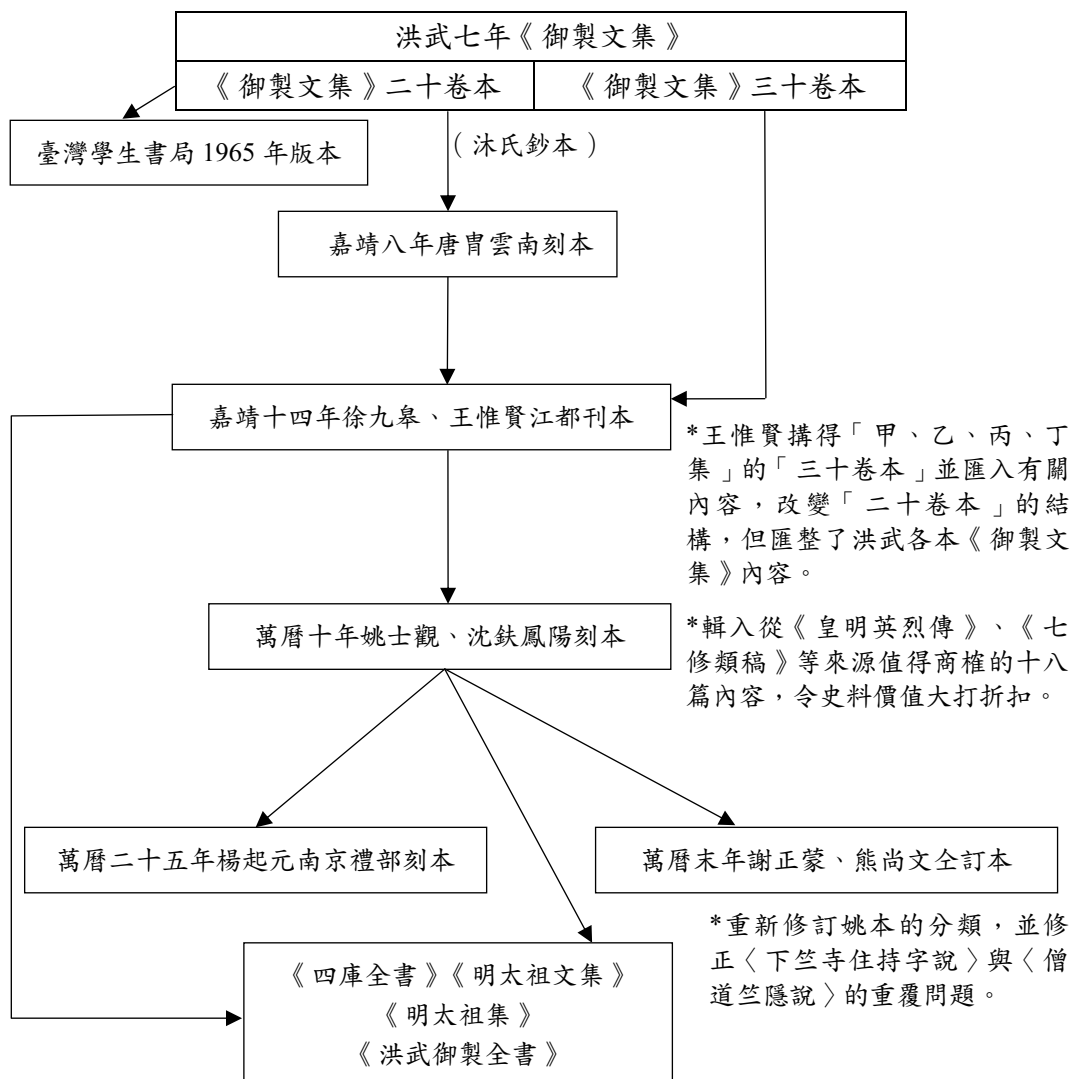
¹⁴⁴ 陳輝，〈朱元璋的「中原」觀及其對漢語的影響〉，《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2.5（寧波：2012），頁123-132。

¹⁴⁵ 張德信，《明史研究論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217-222；張德信、毛佩琦主編，《洪武御製全書》，〈序〉，頁45。

但必須注意的是《御製文集》雖在不同背景及動機下刊刻，但未嘗因學術主張而扭曲其內容，可謂「法祖講學」底下的共識，是故《御製文集》的版本系統可謂是一脈相承（如圖三所示）。嘉靖八年唐胄以沐氏鈔本為底本重刊，為《御製文集》明中後期刊刻的濫觴。嘉靖十四年徐九皋、王惟賢則以唐本為基礎並輯入三十卷本的內容，結合了洪武《御製文集》的兩個版本系統，不僅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更奠定了《御製文集》的格局。但可惜萬曆十年姚士觀、沈鈇在徐本之上輯入《皇明英烈傳》、《七修類稿》等小說稗史的十八篇文本，從而使其真偽難辨，作為研究太祖的史料價值大打折扣。更不幸的是，萬曆二十五年的楊起元南京禮部刻本，萬曆末年的謝正蒙、熊尚文全訂本，以至《四庫全書》的《明太祖文集》，近人出版的《明太祖集》與《洪武御製全書》都是以此為底本。故此，日後從事明太祖研究則必須注意及判別應用的版本與文本。

要之，明代中後期的《御製文集》無疑是嘉靖「法祖講學」底下的產物，而萬曆時期更日漸走向學術上的論爭。這毋寧反映晚明講學思潮下的一種面向，即挪用《御製文集》作為論學資源，不僅改變其敕撰書的性質，更使其深契於晚明的學術論爭，以至改變明初史事的敘述，甚至成為今人出版明太祖文集的底本，深深地影響著往後對太祖的研究與詮釋，可謂意義深遠。

（責任校對：李奇鴻）



圖三：明中後期《高皇帝御製文集》版本刊刻關係圖¹⁴⁶

¹⁴⁶ 從郭傳、宋濂序文的差異足見謝本是以姚本為底本，並非楊本。首先，謝本的宋濂序篇名為〈恭題御製文集後〉沿襲自徐本、姚本，但楊本卻題為〈恭題御製文集後序〉。其二，徐本、姚本與謝本的宋濂〈恭題御製文集後〉中載「使見之者，咸獲咏嘆」，但楊本則載「民獲詠歎」。其三，徐本、姚本與謝本的郭傳序並未附有篇名，但楊本則提〈御製文集後序〉。其四，謝本與徐本、姚本的〈雪詩廣韓文輝韻〉都是「陰極陽生墜玉花，飄飄颯颯遍天涯」，但楊本則載「飄飄颯颯徧天涯」。《高皇帝御製文集》（謝本），〈後序〉，頁 2a、4a；卷 20，頁 21a；《高皇帝御製文集》（楊本），〈後序〉，頁 2a、4a；卷 20，頁 23a；《高皇帝御製文集》（姚本），〈後序〉，頁 2a、4b；卷 20，頁 20b；《高皇帝御製文集》（徐本），〈後序〉，頁 2a、4b；卷 20，頁 15a。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Daming Taizu huangdi yuzhiji*，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內府鈔本善本書膠卷 Xianggang daxue Feng Pingshan tushuguan cang Meiguo guohui tushuguan shezhi guoli Beiping tushuguan cang Ming neifu chaoben shanbenshu jiaojuan。
- 《明太祖御製文集》*Ming Taizu yuzhi wenji*，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65。
- 《明太祖寶訓》*Ming Taizu baoxun*，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 Zhongy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aoyinben，1962。
- 《高皇帝御製文集》*Gaohuangdi yuzhi wenji*，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八年 (1529) 唐胄雲南刻本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Ming Jiajing ba nian (1529) Tang Zhou Yunnan keben。
- 《高皇帝御製文集》*Gaohuangdi yuzhi wenji*，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四年 (1535) 徐九皋王惟賢江都刊本善本書膠卷 Xianggang daxue Feng Pingshan tushuguan cang Meiguo guohui tushuguan shezhi guoli Beiping tushuguan cang Ming Jiajing shisi nian (1535) Xu Jiugao Wang Weixian Jiangdou kanben shanbenshu jiaojuan。
- 《高皇帝御製文集》*Gaohuangdi yuzhi wenji*，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 (1582) 姚士觀沈鈇鳳陽刻本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Ming Wanli shi nian (1582) Yao Shiguan Shen Fu Fengyang keben。
- 《高皇帝御製文集》*Gaohuangdi yuzhi wenji*，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 (1597) 楊起元南京禮部刻本 Meiguo Hafo daxue Yanjing tushuguan cang Ming Wanli ershi wu nian (1597) Yang Qiyuan Nanjing libu keben。
- 《高皇帝御製文集》*Gaohuangdi yuzhi wenji*，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謝正蒙熊尚文全訂本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tushuguan cang Ming Wanli Xie Zhengmeng Xiong Shangwen tongdingben。
- 《御製文集》*Yuzhi wenji*，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Ming keben。
- 丁 丙 Ding Bing，《善本書室藏書志》*Shanbenshu shi cangshuzhi*，《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史部第 927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清光緒二十七年 (1901) 丁氏刻本 Qing Guangxu ershi qi nian (1901) Dingshi keben。
- 尹守衡 Yin Shouheng, 《明史竊》 *Mingshi qie*, 《明代傳記叢刊》 *Mingdai zhuanji congkan* 第 82 冊, 臺北 Taipei: 明文書局 Mingwen shuju, 1991。
- 王士騏 Wang Shiqi, 《皇明馭倭錄》 *Huangming yuwo lu*, 《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史部第 428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Beijing tushuguan cang Ming Wanli keben。
- 王世貞 Wang Shizhen, 《弇州史料後集》 *Yanzhou shiliao houji*, 《四庫禁燬書叢刊》 *Siku jinhuishu congkan* 史部第 50 冊, 北京 Beijing: 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 2000,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 (1614) 刻本 Beijing daxue tushuguan cang Ming Wanli sishi er nian (1614) keben。
- 王崇 Wang Chong, 《嘉靖池州府志》 *Jiajing Chizhou fuzhi*,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 *Tianyige cang Mingdai fangzhi xuankan* 第 8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書店 Shanghai guji shudian, 1981。
- 王鏊 Wang Ao 著, 吳建華 Wu Jianhua 點校, 《王鏊集》 *Wang Ao 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3。
- 丘濬 Qiu Jun, 《大學衍義補》 *Daxue yanyi bu*, 《四庫全書》 *Siku quanshu* 子部第 712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7。
- 永瑢 Yong Rong,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Siku quanshu zongmu tiyao*,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68。
- 江恂 Jiang Xun, 《乾隆清泉縣志》 *Qianlong Qingquan xianzhi*, 《中國地方志集成》 *Zhongguo difangzhi jicheng* 湖南府縣志輯第 37 冊, 南京 Nanjing: 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 2002, 清乾隆二十八年 (1763) 刻本 Qing Qianlong ershi ba nian (1763) keben。
- 何喬遠 He Qiaoyuan, 《名山藏》 *Mingshan cang*, 《明代傳記叢刊》 *Mingdai zhuanji congkan* 第 74 冊, 臺北 Taipei: 明文書局 Mingwen shuju, 1991。
- 吳穎 Wu Ying, 《順治潮州府志》 *Shunzhi Chaozhou fuzhi*, 《中國地方志集成》 *Zhongguo difangzhi jicheng* 善本方志類第二編第 52 冊,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14, 清順治十八年 (1661) 刻本 Qing Shunzhi shiba nian (1661) keben。
- 呂柟 Lü Nan, 《涇野先生文集》 *Jingye xiansheng wenji*,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部第 61 冊, 臺南 Tainan: 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 1997, 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四年 (1553) 于德昌刻本 Hunan tushuguan cang Ming Jiajing sanshi si nian (1553) Yu Dechang keben。

- 宋 濂 Song Lian, 《洪武聖政記》 *Hongwu shengzheng 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1。
- 李 贄 Li Zhi, 《李溫陵集》 *Li Wenling ji*, 《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352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明刻本 Ming keben。
- 李 濂 Li Lian, 《嵩渚文集》 *Songzhu wenji*,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部第 71 冊, 臺南 Tainan: 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 1997,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Hangzhou daxue tushuguan cang Ming Jiajing keben。
- 李 顯 Li Yu, 《二曲集》 *Erqu ji*, 《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410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清康熙三十三年 (1694) 高爾公刻後印本 Qing Kangxi sanshi san nian (1694) Gao Ergong ke houyinben。
- 明太祖 Ming Taizu 撰, 胡士萼 Hu Shi'e 點校, 《明太祖集》 *Ming Taizu ji*, 合肥 Hefei: 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 1991。
- 明宣宗 Ming Xuanzong, 《五倫書》 *Wulun shu*, 《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子部第 936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明正統十二年 (1447) 內府刻本 Ming Zhengtong shier nian (1447) neifu keben。
- 皇甫錄 Huangfu Lu, 《近峯聞畧》 *Jinfeng wenlu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子部第 240 冊, 臺南 Tainan: 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 1995,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古今名賢彙語本 Beijing daxue tushuguan cang Ming ke gujin mingxian huiyu ben。
- 郎 瑛 Lang Ying, 《七修類稿》 *Qixiu leigao*, 《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子部第 1123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Beijing tushuguan cang Ming keben。
- 唐 胄 Tang Zhou, 《正德瓊臺志》 *Zhengde qiongtai zhi*, 《海南地方志叢刊》 *Hainan difangzhi congkan*, 海口 Haikou: 海南出版社 Hainan chubanshe, 2006。
- 唐 胄 Tang Zhou 著, 劉美新 Liu Meixin 點校, 《傳芳集》 *Chuanfang ji*, 《海南先賢詩文叢刊》 *Hainan xianxian shiwen congkan*, 海口 Haikou: 海南出版社 Hainan chubanshe, 2006。
- 夏原吉 Xia Yuanji, 《明太祖實錄》 *Ming Taizu shilu*,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aoyinben, 1962。

- _____，〈一統肇基錄〉 *Yitong zhaoji lu*，〈稗乘〉 *Baicheng* 第 1 函第 4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67。
- 秦 炯 Qin Jiong，〈康熙詔安縣志〉 *Kangxi Zhaoan xianzhi*，〈中國地方志集成〉 *Zhongguo difangzhi jicheng* 福建府縣志輯第 31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 Shanghai shudian，2000，清同治十三年 (1874) 刻本 Qing Tongzhishi san nian (1874) keben。
- 耿定向 Geng Dingxiang，〈耿天臺先生文集〉 *Geng Tiantai xiansheng wenji*，〈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部第 131 冊，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1996，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六年 (1598) 劉元卿刻本 Nanjing tushuguan cang Ming Wanli ershi liu nian (1598) Liu Yuanqing keben。
- 高攀龍 Gao Panlong，〈高子遺書〉 *Gaozi yishu*，〈四庫全書〉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29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 婁 性 Lou Xing，〈皇明政要〉 *Huangming zhengyao*，〈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史部第 424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五年 (1526) 戴金刻本 Nanjing tushuguan cang Ming Jiajing wu nian (1526) Dai Jin keben。
- 張廷玉 Zhang Tingyu，〈明史〉 *Ming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4。
- 張居正 Zhang Juzheng，〈明世宗實錄〉 *Ming Shizong shilu*，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aoyin ben，1962。
- 張 鹵 Zhang Lu 編，〈皇明制書〉 *Huangming zhishu*，東京 Tokyo：古典研究會 Gudian yanjiu hui，1967。
- 張德信 Zhang Dexin、毛佩琦 Mao Peiqi 主編，〈洪武御製全書〉 *Hongwu yuzhi quanshu*，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1995。
- 盛 儀 Sheng Yi，〈嘉靖惟揚志〉 *Jiajing weiyang zhi*，〈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 *Tianyige cang Mingdai fangzhi xuankan* 第 1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書店 Shanghai guji shudian，1983，1963 年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殘本景印 1963 nian ju ningbo Tianyige cang Ming Jiajing canben yingyin。
- 郭 勛 Guo Xun，〈皇明英烈傳〉 *Huangming yinglie zhuan*，〈古本小說集成〉 *Guben xiaoshuo jicheng* 第 208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0。
- 陳 建 Chen Jian，〈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Huangming tongji fazhuan quanlu*，〈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史部第 357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九年 (1636) 刻本 Zhejiang tushuguan cang Ming Chongzhen jiu nian (1636) keben。
- 陳衍 Chen Yan, 《元詩紀事》*Yuanshi jishi*, 《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710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浙江圖書館藏清光緒鉛本 Zhejiang tushuguan cang Qing Guangxu qianben。
- 陳懿典 Chen Yidian, 《陳學士先生初集》*Chen Xueshi xiansheng chuji*, 《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ishu congtan* 集部第 78 冊, 北京 Beijing: 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 2000, 明萬曆四十八年 (1620) 曹憲來刻本 Ming Wanli sishi ba nian (1620) Cao Xianlai keben。
- 曾之亨 Zeng Zhiheng, 《乾隆安鄉縣志》*Qianlong Anxiang xianzhi*, 《中國地方志集成》*Zhongguo difangzhi jicheng* 湖南府縣志輯第 74 冊, 南京 Nanjing: 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 2002, 清光緒六年 (1880) 盛賡補刻本 Qing Guangxu liu nian (1880) Sheng Geng bukeben。
- 湛若水 Zhan Ruoshui, 《湛甘泉先生文集》*Zhan Ganquan xiansheng wenji*,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部第 57 冊, 臺南 Tainan: 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 1997,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 (1681) 黃楷刻本 Shanxi daxue tushuguan cang Qing Kangxi ershi nian (1681) Huang Kai keben。
- 湛若水 Zhan Ruoshui 編著, 《聖學格物通》*Shengxue gewu tong*, 桂林 Guilin: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5,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五年 (1866) 資政堂刻本 Zhongshan daxue tushuguan cang Qing Tongzhi wu nian (1866) Zizhengtang keben。
- 費宏 Fei Hong, 《明武宗實錄》*Ming Wuzong shilu*,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aoyinben, 1962。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明儒學案(修訂本)》下冊 *Mingru xuean (xiudingbe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8。
- 楊士奇 Yang Shiqi, 《明太宗實錄》*Ming Taizong shilu*,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aoyinben, 1962。
- _____, 《明宣宗實錄》*Ming Xuanzong shilu*,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aoyinben, 1962。
- 楊起元 Yang Qiyuan, 《訓行錄》*Xunxing lu*,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五年 (1597) 序刊本 Riben neige wenku cang Ming Wanli ershi wu nian (1597) xukanben。

- _____,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 *Taishi Yang Fusuo xiansheng zhengxuebian*,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子部第 90 冊, 臺南 Tainan: 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 1995,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 (1617) 余永寧刻本 Beijing tushuguan cang Ming Wanli sishi wu nian (1617) She Yongning keben。
- _____, 《續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 *Xuke Yang Fusuo xiansheng jiacang wenji*,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部第 167 冊, 臺南 Tainan: 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 1997, 天津圖書館藏明楊見峻等刻本 Tianjin tushuguan cang Ming Yang Jianjun deng keben。
- 葉子奇 Ye Ziqi, 《草木子》 *Caomuz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葉盛 Ye Sheng, 《水東日記》 *Shuidong ri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0。
- 董斯張 Dong Sizhang, 《吳興藝文補》 *Wuxing yiwenbu*, 《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679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明崇禎六年 (1633) 刻本 Ming Chongzhen liu nian (1633) keben。
- 董穀 Dong Gu, 《碧里雜存》 *Bili zacun*,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子部第 240 冊, 臺南 Tainan: 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 1995,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Zhongguo kexueyuan tushuguan cang Ming Wanli Xiushui Shenshi Ke baoyantang mijiben。
- 虞淳熙 Yu Chunxi, 《虞德園先生集》 *Yu Deyuan xiansheng ji*, 《四庫禁燬書叢刊》 *Siku jinhuishu congkan* 集部第 43 冊, 北京 Beijing: 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 2000, 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Beijing daxue tushuguan, Zhongguo kexueyuan tushuguan cang Mingmo keben。
- 過庭訓 Guo Tingxun, 《本朝分省人物考》 *Benchao fensheng renwukao*, 《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史部第 533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啟刻本 Beijing daxue tushuguan cang Ming Tianqi keben。
- 雷禮 Lei Li, 《國朝列卿記》 *Guochao lieqingji*, 《明代傳記叢刊》 *Mingdai zhuanji congkan* 第 32 冊, 臺北 Taipei: 明文書局 Mingwen shuju, 1991。
- _____, 《皇明大政紀》 *Huangming dazhengji*, 《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史部第 353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 (1602) 博古堂刻本 Beijing daxue tushuguan cang Ming Wanli sanshi nian (1602) Bogutang keben。

- 廖道南 Liao Daonan, 《楚紀》*Chuji*,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Beijing tushuguan guji zhenben congkan* 史部第 7 冊, 北京 Beijing: 書目文獻出版社 Shumu wenxian chubanshe, 1988, 明嘉靖二十五年 (1546) 李桂刻本 Ming Jiajing ershi wu nian (1546) Li Gui keben。
- 鄧士龍 Deng Shilong 編, 許大齡 Xu Daling、王天有 Wang Tianyou 點校, 《國朝典故》*Guochao diangu* 中冊,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93。
- 鄧球 Deng Qiu, 《皇明泳化類編》*Huangming yonghua leibian*, 《明代傳記叢刊》*Mingdai zhuanji congkan* 第 79-81 冊, 臺北 Taipei: 明文書局 Mingwen shuju, 1991。
- 錢謙益 Qian Qianyi, 《錢牧齋全集》*Qian Muzhai quanji* 第 3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3。
- 韓浚 Han Xun、張應武 Zhang Yingwu 等纂修, 《萬曆嘉定縣志》*Wanli Jiading xianzhi*,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史部第 208 冊, 臺南 Tainan: 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 1996, 上海博物院藏明萬曆刻本景印 Shanghai bowuyuan cang Ming Wanli keben yingyin, 1996。
- 羅月霞 Luo Yuexia 主編, 《宋濂全集》*Song Lian quanji* 第 2 冊, 杭州 Hangzhou: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 1999。
- 羅汝芳 Luo Rufang 撰, 耿定向 Geng Dingxiang、楊起元 Yang Qiyuan 點評, 《耿中丞楊太史批點近溪羅子全集》*Geng Zhongcheng Yang Taishi pidian Jinxi Luozi quanji*,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部第 130 冊, 臺南 Tainan: 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 1997,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刻本 Fujian shifan daxue tushuguan,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wenxue yanjiusuo cang Ming Wanli keben。
- 顧炎武 Gu Yanwu 輯, 《皇明脩文備史》*Huangming xiuwen beishi*,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Beijing tushuguan guji zhenben congkan* 史部第 8 冊, 北京 Beijing: 書目文獻出版社 Shumu wenxian chubanshe, 1988, 清抄本 Qing chaoben。
- 顧秉謙 Gu Bingqian, 《明神宗實錄》*Ming Shenzong shilu*, 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aoyin ben, 1962。
- 顧憲成 Gu Xiancheng, 《顧端文公遺書》*Gu Duanwen gong yishu*, 《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子部第 943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 Fudan daxue tushuguan cang Qing Kangxi keben yingyin。

二、近人論著

-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 Zhongguo guji zongm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中國古籍總目》*Zhongguo guji zongmu* 集部第 2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2。
- 尤淑君 Yu Shu-chun，《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Mingfen lizhi yu huangquan chongsu: dali yi yu Jiajing zhengzhi wenhua*，臺北 Taipei：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Guoli zhengzhi daxue lishi xuexi，2006。
- 王汎森 Wang Fan-sen，《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Sixiang shi shenghuo de yizhong fangshi: Zhongguo jindai sixiangshi de zaisikao*，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2017。
- 朱鴻林 Chu Hung-lam，《孔廟從祀與鄉約》*Kongmiao congshi yu xiangyue*，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15。
- _____，《儒者思想與出處》*Ruzhe sixiang yu chuchu*，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15。
- 呂妙芬 Lü Miaw-fen，〈晚明《孝經》論述的宗教性意涵：虞淳熙的孝論及其文化脈絡〉“Wan Ming Xiaojing lunshu de zongjiaoxing yihan: Yu Chunxi de xiaolun ji qi wenhua mailuo”，《近代史研究所集刊》*Jindaishi yanjiusuo jikan*，48，臺北 Taipei：2005，頁 1-46。doi:10.6353/BIMHAS.200506.0001
- _____，〈楊岫《知本提綱》研究——十八世紀儒學與外來宗教融合之例〉“Yang Shen Zhiben tigan yanjiu: shiba shiji ruxue yu wailai zongjiao ronghe zhi li”，《中國文哲研究集刊》*Zhongguo wenzhe yanjiu jikan*，40，臺北 Taipei：2012，頁 83-127。doi: 10.6351/BICLP.201203.0083
- _____，〈從儒釋耶三教會遇的背景閱讀謝文海〉“Cong Ru Shi Ye sanjiao huiyu de beijing yuedu Xie Wenjian”，《新史學》*Xinshixue*，23.1，臺北 Taipei：2012，頁 105-158。doi: 10.6756/NH.201203.0106
- 李晉華 Li Jinhua，《明代敕撰書考附引得》*Mingdai chizhuanshu kao fu yinde*，臺北 Taipei：成文出版社 Chengwen chubanshe，1966。
- 李根利 Li Genli，〈《明太祖文集》版本考〉“Ming Taizu wenji banbenkao”，北京大學歷史系 Beijing daxue lishixi 主辦，「第十二屆北京大學史學論壇」“Di shier jie Beijing daxue shixue luntan”，北京 Beijing：2016 年 3 月 25-27 日。
- 姚才剛 Yao Cai-gang，〈論顧憲成對王學的修正〉“Lun Gu Xiancheng dui Wangxue de xiuzheng”，《鵝湖月刊》*Ehu yuekan*，357，新北 New Taipei：2005，頁 46-51。doi: 10.29652/LM.200503.0008
- 張德信 Zhang Dexin，《明史研究論稿》*Mingshi yanjiu lungao*，北京 Beijin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2011。

- 莊興亮 Zhuang Xingliang, 〈明代史家陳建的學術生平及其《皇明通紀》研究述評〉“Mingdai shijia Chen Jian de xueshu shengping ji qi Huangming tongji yanjiu shuping”, 《史學史研究》*Shixueshi yanjiu*, 4, 北京 Beijing: 2013, 頁 27-38。
- 許振興 Hui Chun Hing, 〈論明太祖的家法——《皇明祖訓》〉“Lun Ming Taizu de jiafa: Huangming zuxun”, 《明清史集刊》*Ming Qing shi jikan*, 3, 香港 Hong Kong: 1997, 頁 69-96。
- _____, 〈《洪武聖政記》考索〉“Hongwu shengzhengji kaosuo”, 《東方文化》*Dongfang wenhua*, 40.1-2, 香港 Hong Kong: 2005, 頁 28-38。
- 郭嘉輝 Kwok Ka Fai, 〈略論《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及其史料價值〉“Luelun Daming Taizu huangdi yuzhiji ji qi shiliao jiazhi”,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xuebao*, 61, 香港 Hong Kong: 2015, 頁 171-189。
- 陳時龍 Chen Shilong, 《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 1522-1626》*Mingdai zhongwanqi jiangxue yundong, 1522-1626*, 上海 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07。
- _____, 〈師道的終結——論羅汝芳對明太祖《六諭》的推崇〉“Shidao de zhongjie: lun Luo Rufang dui Ming Taizu Liuyu de tuichong”, 《明史研究論叢》*Mingshi yanjiu luncong*, 10, 北京 Beijing: 2012, 頁 245-253。
- _____, 〈聖諭的演繹：明代士大夫對太祖六諭的詮釋〉“Shengyu de yanyi: Mingdai shidafu dui Taizu liuyu de quanshi”, 《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Anhui shifa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43.5, 合肥 Hefei: 2015, 頁 614-617。
- 陳輝 Chen Hui, 〈朱元璋的「中原」觀及其對漢語的影響〉“Zhu Yuanzhang de ‘Zhongyuan’ guan ji qi dui Hanyu de yingxiang”,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Zhejiang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42.5, 寧波 Ningbo: 2012, 頁 123-132。
- 陳學霖 Chan Hok-lam, 《明代人物與傳記》*Mingdai renwu yu zhuanji*, 香港 Hong Kong: 中文大學出版社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1997。
- _____, 《宋明史論叢》*Song Ming shi luncong*, 香港 Hong Kong: 中文大學出版社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2012。doi: 10.978.962996/4764
- 陳顥哲 Chen Haoche, 《博學與考據：焦竑對陽明心學的修正》*Boxue yu kaoju: Jiao Hong dui Yangming xinxue de xiuzheng*, 香港 Hong Kong: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論文 Xianggang jinhui daxue zhongwenxi zhexue boshi lunwen, 2016。

- 楊永康 Yang Yongkang, 〈洪武官修《皇明寶訓》及其史料價值略論〉“Hongwu guanxiu Huangming baoxun ji qi shiliao jiazhi luelun”, 《國學研究》 *Guoxue yanjiu*, 28, 北京 Beijing: 2011, 頁 143-161。
- 楊豔秋 Yang Yanqiu, 〈明代中後期私修當代史的繁興及其原因〉“Mingdai zhonghouqi sixiu dangdaishi de fanxing ji qi yuanyin”, 《南都學壇》 *Nandu xuetan*, 23.3, 南陽 Nanyang: 2003, 頁 27-30。
- 劉 勇 Liu Yong, 《中晚明士人的講學活動與學派建構：以李材（1529-1607）為中心的研究》 *Zhongwan Ming shiren de jiangxue huodong yu xuepai jiangou: yi Li Cai (1529-1607) wei zhongxin de yanjiu*,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15。
- _____, 《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 *Biandong buju de jingdian: Mingdai Daxue gaiben yanjiu*, 北京 Beiji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16。
- 劉曉東 Liu Xiaodong, 〈「三教合一」思潮與「三一教」——晚明士人學術社團宗教化轉向的社會考察〉“‘Sanjiao heyi’ sichao yu ‘sanyi jiao’: wan Ming shiren xueshu shetuan zongjiaohua zhuanxiang de shehui kaocha”, 《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Dongbei shida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1, 長春 Changchun: 2002, 頁 21-27。
- 瞿冕良 Qu Mianliang 編著, 《中國古籍版刻辭典（增訂本）》 *Zhongguo guji banke cidian (zengding ben)*, 蘇州 Suzhou: 蘇州大學出版社 Suzhou daxue chubanshe, 2009。
- 魏月萍 Ngoi Guat Peng, 《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論述》 *Junshi daohe: wan Ming ruzhe de sanjiao heyi lunshu*,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2016。
- 山根幸夫 Yamane Yukio, 〈明太祖と「寶訓」〉“Mentaiso to ‘Takara Satoshi’”, 收入東方學會 Tōhōgakkai 編, 《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文集》 *Tōhōgakkai sōritsu go jū-shūnen kinen tōhō-gaku ronbun-shū*, 東京 Tokyo: 東方學會 Tōhōgakkai, 1997, 頁 1157-1170。
- Huang, Martin W. “Sage, Hero and Bandit: Zhu Yuanzhang’s Imag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ovel Yingle Zhuan,” in Sarah Schneewind (ed.), *Long Live the Emperor! Uses of the Ming Founder across Six Centuries of East Asian History*. Minneapolis: Society of Ming Studies, 2008, pp. 137-148.

Modeling the Ancestors and Discoursing on Learning: The Publication of Ming Taizu's Literary Collection - the *Gao huangdi yuzhi wenji* - and Its Significance from the Mid to Late Ming

Kwok Ka Fai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uhai)
Sun Yat-sen University
raymond.kkf@gmail.com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ublication of various editions of Ming Taizu's 明太祖 literary collection during the Jiajing 嘉靖 (1522-1566) and Wanli 萬曆 (1573-1620) era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mpact upon the intellectual elite of the Great Rites Controversy and the Jiajing emperor's ritual reforms. First, it shows that Ming Taizu's literary collection was primarily bestowed to nobles and princes as a gift. Thus, most intellectuals did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ersonally read the collection in the period immediately following its publication, and its content came to be disseminated via quotations found in Chiu Jun's 丘濬 (1421-1495) works. The second section of the article explains how scholars like Zhan Ruoshui 湛若水 (1466-1560) made use of Taizu's positions to support their doctrines. This led to his literary collection becoming closely related to discourses on learning during the late Ming, which in turn resulted in its being published in greater numbers. Third, it discusses the value of,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editions of Taizu's literary collection, and shows that content from unreliable sources came to be inserted into the text during the Wanli period. Finall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political culture during the Jiajing era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publication of Taizu's literary collec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intellectual discourse.

Key words: Ming Taizu, *Collected works of the emperor*, the Jiajing reign period, discourses on learning

(收稿日期：2018. 3. 7；修正稿日期：2018. 6. 1；通過刊登日期：2018. 11. 28)